

台北市選民分裂投票之研究 民國八十七年市長市議員選舉之分析^{*}

吳怡銘^{**}

《 本文摘要 》

選民的投票意向一直是政治學界注意的焦點，但是在秘密投票的限制下，能得知「個別」選民的投票態度與決定，唯有依靠民意調查，不過所得之答案的真實性則令人懷疑。對選舉唯一能確定的是，選舉後選民「集體」決定後的結果，但若是希望藉由得票結果資料作為個人投票態度的推論，恐怕會有「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 的風險。本文以八十七年台北市選舉各投票所之得票記錄分析選民對各政黨市長和市議員候選人分裂投票的現象，嘗試運用King 的EI 模型，跨層次推論分析選民在三黨市議員候選人與三黨市長候選人之間的抉擇，並初探性利用統計方法降低區位謬誤的風險。結果發現，與外界預期新黨市議員支持者大多採取分裂投票，投票支持國民黨市長候選人馬英九，其分裂投票率高達98.29%。另外，國民黨市議員支持者亦有分裂投票的情形，主要分裂投票對象為民進黨市長候選人陳水扁，分裂投票率為48.28%。

關鍵詞：區位謬誤、分裂投票、台北市選舉、策略投票

* 本文感謝黃紀教授、吳重禮教授與洪永泰教授的指導及出版前評審人的意見。本文所呈現圖片、表格特別感謝國立中正大學黃紀教授授權使用「南台灣『選舉地緣』之詳實資料庫：1986-2000」之電子地圖及統計應用軟體。

**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現任北市成德國小教師。

壹、前言

民國八十七年底，台北市舉行了市長、立委、市議員三合一的選舉，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市長選舉，國民黨籍的候選人馬英九獲得了51.13%的選票，此一結果幾乎是上屆市長選舉時國民黨黃大洲與新黨趙少康二人選票的總和，以高出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票數766,377票七萬多票而贏得勝選；而陳水扁的得票率為百分之45.91%，比上屆市長選舉只增加了2.22%，失去連任的機會；在新黨候選人得票部份，則較上屆候選人趙少康的得票數大幅度滑落，僅獲得2.96%。（中央選舉委員會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庫）。

在市議員選舉的部份，如同上屆市議員選舉的結果一樣，發生所謂「三黨不過半」的情形。國民黨在議員52個席位中取得23個席位；民進黨則從上屆的15席進步到19席；新黨則由8席成長為9席；無黨籍為1席（註一）。

上述說明的是八十七年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結果之變化，而在這次選舉之中，省籍、族群因素似乎再次被強調。第一屆市長選舉有所謂的「棄黃保陳」效應，目的是希望本省籍選民能夠將選票集中到本省籍候選人陳水扁身上，避免因為外省籍選民的選票集中、本省籍選票的分散，而讓新黨候選人趙少康當選；在八十七年底的市長選舉則有所謂的「棄王保馬」以及「新台灣人」效應，「棄王保馬」效應在於希望外省籍族群能將選票轉向，投給同是外省籍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而李登輝總統提出的「新台灣人」，則在於希望穩固原先支持國民黨的本省籍選民，避免因為省籍的問題而造成國民黨選情的不利（中時電子報 1998.12.06）。

但棄保效應似乎僅發生在市長選舉，在棄保效應的因素考量下，有可能造成選民在進行不同類別公職人員選舉時，產生不一樣的抉擇，原支持新黨的外省籍選民可能為了避免市長選舉由本省籍候選人當選，而投給較有可能勝選的國民黨外省籍候選人，但是在另一公職選舉則仍投給新黨候選人；如此，使選民在同一次選舉中有兩項以上公職人員選舉時，選民分別投票給不同的政黨，採取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而選民採取分裂投票則有可能產生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分屬不同的執政政黨。

針對分裂投票、分立政府此兩種現象，在國外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相形之下在國內的文獻中則較少提到（洪永泰 1995；陳義彥 1995；黃德福 1991），一方面是以往台灣公職人員大多由國民黨一黨執政，分立政府的情況較少。不過隨著各項行政首長的民選、新黨的成立以及民進黨實力的提昇，有許多的縣市首長或議會成為非國民黨執政，

國內分立政府產生的機會因此增加。在選民的投票行為上，面對同時舉行不同類別的選舉時，政黨類別、候選人數的增加也會使得分裂投票的行為增加，因此在往後的政治學領域裡中，分裂投票、分立政府將成為研究投票行為的熱門問題。

另外分裂投票的研究對於先前投票行為的理論做了新的檢測與挑戰。在以往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中，多認為政黨認同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因素，但是分裂投票的產生，代表著政黨認同的影響力漸漸減弱，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因而轉為候選人取向或是議題取向。選民在面對不同的公職人員競選時，對於不同公職人員有不同的政黨選擇，如此可能造成分立政府（DeVries and Tarrance 1972；Miller 1992，335-352）。

選民採取分裂投票除了因為政黨認同的減弱外，選舉過程中總統裙帶效應（coat-tail effects）的減弱亦可能造成選民分裂投票，藉由高知名度的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帶動議員選舉的選情，使得同黨的公職人員都能夠順利當選，這樣的效應似乎已經下降（Ferejohn and Calvert 1984，127-146；吳重禮 1998，65-69）。以上的因素僅是部份解釋選民分裂投票的可能性，更有許多學者由不同的因素來解釋選民分裂投票的行為，分裂投票的研究已引起學界的重視。

分裂投票的研究對國內而言，是一個較新的研究方向。八十七年北市三合一選舉正好提供了研究、觀察的素材。選民必須在同一時間點對兩種公職選舉從事投票抉擇。本研究將焦點集中於三合一選舉中的市長選舉和市議員選舉，原因是這兩者的選舉層級同屬於地方性的選舉，有別於立法委員選舉乃是屬於中央層級的選舉。當選民在面對兩種不同層級的選舉時，在投票考量上可能就會產生不同的偏好，因此針對相同層級的選舉進行分析，目的在希望能排除選民分裂投票時，屬於不同層級選舉的考量。另外，對市長選舉以及市議員選舉進行研究，乃是針對分立政府現象的注意。以往分立政府所探討的大多為美國總統與參議院或眾議院分別為不同政黨所掌握。在聯邦政府的層級產生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分立。但近來美國州政府地方層級的分立政府比例有上昇的趨勢（吳重禮 1998，66），而台北市選舉屬於地方層級，因此研究針對市長選舉與市議員選舉，也在於注意台北市地方政府行政部門與議會分立情形，有別於中央層級行政院與立法院分立政府的情形。

作者希望藉由本研究進行分裂投票的探討。針對第二屆台北市長選舉以及第八屆市議員選舉的總體資料（aggregate data）做跨層次推論，瞭解選民在此次公職人員選舉的投票傾向。具體來說，本研究想要瞭解的是，選民在市長、市議員這兩種公職人員選舉的投票上是否一致或是分裂？當面對不同的公職人員選舉時，選民是將選票投給同一個政黨候選人？亦或是分別投給不同的政黨候選人？如果選民是採取分裂投票，其模式為何？也就是說，假若在市長選舉的部份，選民選擇國民黨籍候選人，那麼在市議員選

舉的部份，選民的選擇會是民進黨籍候選人或是新黨候選人？

貳、分裂投票行為

所謂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是指在同一地區、同一時間且同一次的選舉中，有兩類以上公職人員的選舉一併舉行，而選民將選票分別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洪永泰 1995；Burden and Kimball 1998；黃紀 1999）。例如選民若在八十七年市長選舉中投票給國民黨籍的馬英九，而在市議員的選舉部份，卻投票給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這就是一種分裂投票。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個別的選民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採取一致或分裂投票？換言之，產生分裂投票的選民的動機以及影響選民做出分裂投票的因素為何？

大致上來說，歸納現今學者討論選民分裂投票之可能原因，主要分為二大學派。一、刻意說（intentional factor）：有部份的學者認為，分裂投票的原因在於選民有計畫性的、蓄意採取分裂投票，希望能造成一個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使政府政策的產出能是一個溫和、平衡的政策。（Fiorina 1992；Ingberman and Vollandi 1993；Jacobson 1990）。因此這一部份學者所認為的選民分裂投票因素，可歸納為刻意因素。

就選民刻意分裂投票而言，Fiorina 認為選民並非是因為無法辨別民主、共和兩黨的差異而增加分裂投票，而是因為選民投票時主要是看各黨在政策上的立場。在祇有一種公職人員選舉時，選民能夠區別出政黨意識型態上的差異，因此投票時選民會表達其政策偏好及意識型態的立場。但若是同時舉行兩類的選舉，選民則會將各項選舉一併的考慮，選民希望分裂投票能產生分立政府，利用行政與立法部門分屬於不同的政黨，能中和政策的產出以符合選民的立場（Fiorina 1988，442-53；1989，24-28；1992，73-82）。

但是此一論點有受質疑之處，如選民是否有足夠的政治訊息進行評估而採取分裂投票；選民是否能清楚的瞭解自己分裂投票的目的在於形成分立政府，以進一步達成溫和的政策（吳重禮 1998，70）。Born（1994）也認為選民關注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的議題並不相同，國會選舉的議題屬於地域性，強調選區服務，而總統選舉的議題是全國性的，所以才可能採取分裂投票，而非為了制訂一個平衡政策。同時，對於行政權的制衡，選民並非僅依賴國會，而政黨相互的制衡也非唯一的力量，有時同黨議員也可發揮制衡的力量。

再者，若依照理性抉擇的觀點來看，選民的投票是經由理性的計算，將自己投票立場設定在符合自身利益的議題上，然後考察各個候選人或是各黨派在這個議題上的觀點，最後投票贊同在這個問題上與自己觀點最接近的黨派或候選人。如學者 Downs

(1957)認為政黨的意識型態或是議題的設定上都會趨向於中庸以爭取中間選民，造成選民無法區分政黨的差異，選民無法做理性投票。如此說來，政黨界線、議題立場等將趨向於模糊，選民是否能夠清楚的區分政黨或議題的差異？同時，選民如何能夠在理性的考量下投票給與自己利益差距較大的候選人或政黨？

二、非刻意說 (unintentional factor)：此一學派學者認為選民分裂投票乃是一種非計畫性的，亦即並非是選民內心故意採取分裂投票。選民投票採取分裂投票可能是因為不同公職選舉，其競爭的程度並不相同，例如眾議員的選舉，現任者基於選區服務、知名度等優勢較易於勝選，而參議員的選舉則因為各候選人皆擁有高知名度，現任者也往往少於選區服務，因此選舉競爭的程度較為激烈，造成選民投票對象並非一定限於現任者，而可能轉投給其他黨派的候選人(Jacobson 1990)，另外，現任者的所擁有的優勢主要是靠知名度，因為總統層次以下的選舉，選民資訊較為不足，現任者的知名度往往較高，若是控制了政黨認同的變項後，挑戰者的知名度較高就較可能贏得選舉(Beck, Baum, Clausen and Smith 1992)，因此當選民在面對兩類選舉同時舉行時，選民會以候選人為考量進行投票，有可能產生分裂投票；選民採取分裂投票或者是因為政黨之間意識型態的模糊，使得選民無法清楚分辨政黨的界線，導致選民黨性的減弱，選民的投票抉擇改用其他的因素作為標竿，例如候選人、所舉行選舉的重要性、選民對選舉的興趣等等(Born 1994；Soss and Canon 1995；Wattenberg 1991；Maddox 1981；DeVries and Tarrance 1972)；而選民利益、候選人因素也可能影響選民採取分裂投票，對選民來說或許不知道議題具體的解決方案，但至少能知道哪一黨或哪一位候選人較知道議題的重要性及解決能力。依據議題與候選人之間做連結來做投票的依據，因而造成選民採取分裂投票(Beck, Baum, Clausen and Smith 1992；Campbell and Miller 1957；Jacobson 1990；Kiewiet 1983)。

有些學者則認為選舉制度的不同，也會影響選民採取分裂投票(Rusk 1970)。行政首長屬於單一選區制度(single-member district system)，因此在首長選舉競爭中往往會形成兩個政黨的競爭，政黨候選人代表該政黨而有濃厚的政黨對決的意味，同時政黨為爭取更多選民的認同，在議題上也會較為溫和，模糊政黨意識型態使黨性變得不重要(Frymer 1994)，以爭取中間選民的選票。因此選民在投票時較不會依照政黨取向投票，因此政黨認同減弱。但是我國在民意代表選舉，部份屬於大選區區的選舉制度，當選者不只有一名，有多席次當選機會，因此候選人大多會針對人口區域、特定議題進行競選，以求當選票數之門檻即可。候選人並不要求中間選民認同，因此利用政黨標籤或是省籍因素等吸引部份選民，無論在意識型態或是政黨上的區隔將會呈現多元(Cox 1990，903-935)，所以當不同公職選舉同時舉行時，就很有可能產生分裂投票。

Riker (1982) 則認為選民在面對選舉環境時，會棄小黨就大黨而採取策略投票 (strategic voting)，這是選民經過計算的結果，選民認為自己喜好的政黨失去當選的機會時，可能會把票投給自己較不討厭的其他政黨，來防止自己最討厭的政黨獲勝。Bawn (1993, 965-989; 1999, 487-505) 也指出選民受到選舉制度的影響，在理性的考量下會採取策略投票而可能形成分裂投票。在德國兩票制的聯邦議會選舉，一票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當選，另外一票為政黨比例代表。在計算議會席次時，是以第二票政黨得票率為準，決定各政黨的總席次，扣除各政黨在單一選區已當選的席次，再分配比例代表席次 (王業立, 1998: 41)。選民在單一選區的投票部份，會因為避免浪費自己的選票，由原先支持較沒有勝選機會的小黨候選人，轉而支持有機會勝選的大黨候選人；而在政黨名單的抉擇時則會維持支持較小的政黨，其主要可能的原因在於選民對於不同選舉制度所選出之立法者有不同的期待，認為其代表的意義並不相同；同時，當單一選區選舉有現任者尋求連任或是競爭激烈時，分裂投票的情形就越明顯。

學者針對複數選區進行研究後指出，在選舉期間選民會根據理性評斷候選人，為了避免浪費選票在極不可能當選的候選人或是超人氣的候選人身上，選民會採取策略性投票而轉移投票的目標，把票投給介於當選邊緣與落選之間的候選人，如此有可能形成分裂投票。而根據策略性投票，可觀察出選舉區呼聲最高的政黨或候選人的數目上限值，該上限值乃是該選區應選人數加1 (Cox 1994, 608-621; Cox 1997)。

上述刻意說與非刻意說兩大學派皆未能周延的說明選民為何分裂投票，因此有必要從多方面進行討論，才能明瞭分裂投票的原因。同時由於國情的不同、制度的特性，選民投票的思考模式應有所不同。如省籍因素就國內來說即是一個重要因素。以往本省籍選民較多支持民進黨，外省籍選民則比其他族群團體更支持國民黨 (林佳龍 1988, 113)，其中又以眷村居民較為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即所謂的「鐵票效果」 (陳連生 1986, 186)。不過由於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開放多項選舉、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新黨的成立，造成原有支持國民黨籍的外省籍選民分散了支持的政治取向，當一位候選人強調其省籍族群對立，將會使得外省籍的選民陷入議題與政黨認同的考量。根據台北市族群的政黨支持研究發現，八十三年第一屆台北市長選舉時，閩南籍、客家籍的台北市選民皆傾向支持於陳水扁，同時在族群認同的議題上，自述認同「台灣人」的台北市選民，亦較傾向支持陳水扁 (戴立安, 1999)。另外，學者針對第一屆台北市長選舉研究發現，族群因素乃是影響選民進行投票考量相當重要的因素，選民會將族群差異與政黨劃上等號，再將政黨色彩、標籤與候選人相連結，並產生「棄黃保陳」的議題而進行投票，才造成在第一屆市長選舉以及同時舉行的市議員選舉時產生了分裂投票 (王甫昌, 1998: 143-232)。

沒有單一的變數或是理論，可以適當的解釋選民為何採取分裂投票，況且不論切入的理論角度為何，最重要的共通前提應該是要先確定分裂投票的現象是否存在，也就是說應先描述選民分裂投票的程度、模式與分佈為何，然後才進一步解釋分裂投票的現象為何發生。本文即是先對八十七年三合一選舉做初探性的檢視，估計市議員支持者對市長候選人的支持一致與否的程度。

參、待驗假設

針對此次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選舉的部份，共有三個政黨推出候選人，分別為國民黨的馬英九、民進黨陳水扁、以及新黨王建煊。在市議員選舉部份，全台北市分為六個選區，每一選區當選席次不只一席，因而角逐議員席次者衆，若是根據各候選人於選舉公報上之黨派進行研究，也同時考慮市議員選舉可能棄權之選民，在資料處理將會相當複雜，並予研究分裂投票之概念有所差距，因而市議員黨派類別主要區分為三個主要政黨。另外；筆者假定選民投票考量上較重視市長選舉，且投票的抉擇上會先考慮市長人選，再考慮市議員人選。有鑑於此，在市長選舉中棄權卻專程去投市議員的機率相當小，故研究中將不考慮市長選舉單項棄權的選民。

另外，在此選舉中有所謂「棄王保馬」效應，選民在市長選舉的部份可能採取策略投票。根據策略投票的考量，當選呼聲較高的候選人數目為應選席次（註一）（Cox 1994，608-621），因此在市長選舉呼聲較高應該僅有二人，但此次市長選舉卻有三個政黨候選人，而王建煊在選前氣勢較弱，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決較為激烈。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民根據理性的抉擇，原新黨的支持者可能在市長選舉時，會放棄支持新黨候選人，轉而支持呼聲較高的次佳人選。若是明知新黨市長候選人當選無望仍將票投給王建煊的選民，多半是對新黨效忠的選民，因此這一部份的選民在市議員選舉也最可能採取一致投票，支持新黨市議員，較少可能採取分裂投票支持其他政黨候選人。

在市長選舉部份有棄保效應的問題，促使選民不依照原先的政黨認同投票，轉而支持他黨的候選人，但在市議員的選舉上卻沒有所謂的棄保效應，國內議員選舉所採行的是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採複數席次當選，選民沒有策略投票的顧慮，可以針對特殊議題、省籍等因素選擇原先政黨認同的候選人，因此市議員選舉較能反映出選民原先的政黨偏好。另外，在台北市實施較為成功的「強制配票」競選策略，也使市議員選舉強調於「選黨重於選人」，因而使市議員得票情形較能夠呈現出選民政黨偏好。就以上的說明並且根據研究需要，整理出表1，歸納選民投票的模式。前面的英文單字為選民對市議員候選人的政黨認同，後面的英文單字為選

民對市長候選人的政黨認同。以 KD 型為例，K 代表選民在市議員選舉投票認同國民黨，D 則是表示選民在市長選舉認同民進黨。

其中投票模型的 OK 型投票、OD 型投票及 ON 型投票，意謂為選民在市議員投給三個主要政黨以外的候選人，在市長選舉的部分則投票給三黨任何一位候選人。由於這三類型投票模式所支持的市議員之政黨並無提名該黨市長候選人，所以無法看出該黨支持者採取分裂投票或一致投票；另外有三個投票模式是在市議員選舉棄權，但在市長的選舉有去投票（AK 型投票、AD 型投票、AN 型投票），這三個投票模型也無法看出選民原有的政黨認同，而在市長選舉採取一致投票或是分裂投票。其餘的九個投票模式為本研究的焦點，可區分為兩大類型：一致投票與分裂投票。

表1 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一致與分裂投票之可能模式

		市 長 選 舉			
		國民黨（K） 馬英九	民進黨（D） 陳水扁	新 黨（N） 王建煊	
市 議 員 選 舉	國民黨（K）	KK 型一致	KD 型分裂	KN 型分裂	得票紀錄
	民進黨（D）	DK 型分裂	DD 型一致	DN 型分裂	得票紀錄
	新 黨（N）	NK 型分裂	ND 型分裂	NN 型一致	得票紀錄
	其 他（O）	OK 型投票	OD 型投票	ON 型投票	得票紀錄
	棄 權（A）	AK 型投票	AD 型投票	AN 型投票	得票紀錄
		得票紀錄	得票紀錄	得票紀錄	

一、一致投票：

- 1.KK 型一致投票：表示在市長的選舉以及市議員的選舉，選民都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 2.DD 型一致投票：選民在市議員選舉及市長選舉都選擇了民進黨籍候選人，所謂對民進黨效忠的支持者；
- 3.NN 型一致投票：是指在市議員選舉及市長選舉皆支持新黨籍候選人，這一部份可以說是新黨死忠的支持者。

二、分裂投票：

- 1.KD 型分裂投票：表示在市議員的選舉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但是在市長的部份

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

2.KN 型分裂投票：代表市議員的選舉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但是在市長的部份則支持新黨的候選人；

3.DK 型分裂投票：表示在市議員選舉支持民進黨籍候選人，而在市長選舉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

4.DN 型分裂投票：代表市議員選舉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而市長選舉卻支持新黨籍候選人；

5.NK 型分裂投票：表示選民在市議員選舉選擇新黨籍候選人，在市長選舉卻選擇國民黨籍候選人，這一部份的分裂投票模式也是本研究的焦點；

6.ND 型分裂投票：代表選民在市議員選舉選擇新黨籍候選人，而在市長選舉則選擇民進黨籍的陳水扁。這一型的分裂投票模式與 DN 型的分裂投票，是選民在投票時擺脫兩政黨的意識對立做出選擇，會頗耐人尋味；

據以上的設定與推論，提出以下待驗證的假設：

假設一：比較各黨派，新黨市議員候選人的支持者把市長選票投給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的比例較高，投給民進黨市長候選人（陳水扁）的比例較低。

由於市長選舉競爭激烈，民進黨市議員候選人的支持者，為了使同黨市長候選人陳水扁順利連任，理應將選票投給民進黨市長候選人，即所謂的一致投票。若是在省籍因素與統獨立場上考量，民進黨市議員支持者在市長選舉時，不可能支持新黨候選人，所以不會採取 DN 型分裂投票模式。據此提出第二個待驗假設：

假設二：比較各黨派，民進黨市議員候選人的支持者把市長選票投票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的比例較高，投給新黨市長候選人（王建煊）的比例較低。

肆、研究方法

資料蒐集方式的不同，研究途徑也大不相同，學者嘗試從民意調查或是總體資料兩種途徑進行分析。例如 Campbell 與 Miller（1957）運用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1952年以及1956年的民意調查資料，研究選民面對多項選舉，採取分裂投票的動機。Beck 等人（1992）也運用民意調查資料分析俄亥俄州（Ohio）分裂投票的選民特徵，以及候選人的知名度與分裂投票的相關性。而 Rusk（1970）則運用總體資料進行分裂投票分析，比較不同的選舉制度對於分裂投票的影響為何。Bawn（1999）也針對1969年到1987年德國聯邦議會選舉進行分裂投票的探討，利用選舉結果的資料，計算主要政黨候選人得票的差距，並且分析造成得票差距的因素，更進一步說

明德國聯邦議會的選舉制度造成選民採取分裂投票。

部份學者則是同時使用個體資料與總體資料進行分裂投票分析，如洪永泰（1995）運用投開票所紀錄以及抽樣調查，針對1994年台北市長及市議員選舉進行分裂投票的分析，其研究目的在於，估計出1994年台北市選舉的分裂投票選民數，對於選民分裂投票行為進行人文區位分析，然後進一步檢驗影響分裂投票的重要因素。陳義彥（1995）則利用投開票所紀錄與民意調查個體資料進行分裂投票分析，總體資料主要在於瞭解各黨派在各項選舉得票比例，並計算出不同選舉間各黨得票的差距。而分析選民採取分裂投票的動機，主要是依據在選前與選後固定樣本連續研究的資料進行探討，瞭解分裂投票的選民在政治態度以及人口學特徵上的差異。

Burden 與 Kimball（1998）同樣利用總體資料與民意調查資料進行分裂投票的探討，其主要是運用 King（1997）的跨層次推論方式進行分析，目的在避免以往運用總體資料推論個體資料可能產生的「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Robinson 1950）。在推估出分裂投票的比例後並進一步與個體資料作比較，利用個體資料作檢驗，加以補充說明分裂投票的動機。

就本研究而言，投票研究固然屬個人層次行為之研究，但因個體資料蒐集困難，民意調查並非每位研究者可輕易獲得，因此唯有仰賴集體資料。不過運用集體資料進行跨層次推論，此一方法較見長於描述性質的推論，而較見短於因果推論，個人資料因集結集體數據時的流失，使得可用之解釋變數減少，甚至是無法搭配使用（黃紀、張益超 2000）。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於描述性質的推論。也就是採用台北市選舉委員會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合一選舉」結束後所公佈之選舉結果，以及台北市八十七年底年終人口靜態統計報表之數據，進行選民分裂投票的各種模式的比例推估。以上兩種的資料，前者資料以投開票所為單位，後者以里為統計單位，而無論是投開票所投票紀錄或是以里為單位的統計數據都屬於一種總體資料（aggregate data）。根據總體資料，我們可以將「某一層次的關係（relationships）推論至另一個不同的層次」，這即是統計上所謂的跨層次的推論（Achen and Shively 1995，1）。而總體資料推論至個人的層次會有「區位謬誤」的危險，不過由於「秘密投票」之規定，無法取得個別選民的資料，但由於統計技術上的進步，仍可以藉跨層次的推論分析，瞭解台北市各區選民分裂投票的程度大小以及模式。

從事跨層次分析，古德曼模型（Goodman model）及其延伸出來的方法，是一個可以用來將總體層次的資料推論至個體層次參數值的方式，根據表1的分裂投票模式分類以及統計上關係，我們可以進一步設定表1中之細格的參數，進行跨層次的推論（表2）。

表2 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一致投票與分裂投票率

		市 長 選 舉		
		國民黨 (K) 馬英九	民進黨 (D) 陳水扁	新 黨 (N) 王建煊
市 議 員 選 舉	國民黨 (K)	P_{KK}	P_{KD}	$P_{KN} = 1 - P_{KK} - P_{KD}$
	民進黨 (D)	P_{DK}	P_{DD}	$P_{DN} = 1 - P_{DK} - P_{DD}$
	新 黨 (N)	P_{NK}	P_{ND}	$P_{NN} = 1 - P_{NK} - P_{ND}$
	其 他 (O)	P_{OK}	P_{OD}	$P_{ON} = 1 - P_{OK} - P_{OD}$
	棄 權 (A)	P_{AK}	P_{AD}	$P_{AN} = 1 - P_{AK} - P_{AD}$

在表2中的 P_{KK} 表示的是一種投票模式的機率，為選民在市長選舉以及市議員選舉都支持國民黨候選人之 KK 型一致投票機率；以此類推， P_{KD} 表示 KD 型分裂投票模式的機率。而表中的 P_{DK} 、 P_{DD} 分別表示的是 DK 型分裂投票、DD 型一致投票兩種投票模式的機率；同樣的， P_{NK} 、 P_{ND} 表示的是 NK 型分裂投票、ND 型分裂投票兩種投票模式的機率；我們可以知道在表格最下邊兩欄的每一個細格所表示的是， P_{OK} 、 P_{OD} 在市議員部份支持非三大黨的候選人，市長選舉則特定支持對象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 OK、OD 投票模式，以及 P_{AK} 、 P_{AD} 在市議員選舉棄權但市長有去投票的機率。

表2的統計關係可以線性迴歸式 (Linear regression) 來表達，這是一種多黨體系中適用的 Simple Goodman model (Achen and Shively 1995 , 34-38)。假設 i 代表第 i 個選民 ($i = 1, 2, \dots, N$)， k_{2i} 為依變數，即表示第 i 個選民在市長選舉中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 (k)，同時， k_{1i} 為自變數之一，即表示第 i 個選民在市議員選舉的部份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d_{1i} 表示第 i 個選民在市議員選舉的部份支持民進黨候選人；同理， n_{1i} 表示第 i 個選民在市議員選舉的部份支持新黨候選人， o_{1i} 、 a_{1i} 表示第 i 個選民在市議員選舉投給非國民黨、非民進黨與非新黨的其他政黨候選人，或是在市議員部分選舉棄權。 u_i 為干擾值 (disturbance term)。

(式1)

$$k_{2i} = P_{AK} + (P_{KK} - P_{AK}) k_{1i} + (P_{DK} - P_{AK}) d_{1i} + (P_{NK} - P_{AK}) n_{1i} + (P_{OK} - P_{AK}) o_{1i} + u_i$$

$$(i = 1, 2, \dots, N)$$

若依照上述公式將該黨派在各里的得票加總起來，除以該里之有效票數，則將得到各黨派候選人在各里之得票比例，這些加總所得之總體變數，均以大寫英文字母表示

之，例如 K_{2j} 表示第 j 個里的選民在市長選舉部份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的比例（ $K_{2j} = (1/n_j) \sum k_{2ji} \dots$ ）。最後會得到一個新的迴歸式（如式2），而此迴歸式是以投票所而非以個體為觀察單位（observation unit）。同樣我們也可推導出（式3）。

（式2）

$$K_{2j} = P_{AK} + (P_{KK} - P_{AK}) K_{1j} + (P_{DK} - P_{AK}) D_{1j} + (P_{NK} - P_{AK}) N_{1j} + (P_{OK} - P_{AK}) O_{1j} + U_{1j}$$

$$(j = 1, 2, \dots, M)$$

（式3）

$$D_{2j} = P_{AD} + (P_{KD} - P_{AD}) K_{1j} + (P_{DD} - P_{AD}) D_{1j} + (P_{ND} - P_{AD}) N_{1j} + (P_{OD} - P_{AD}) O_{1j} + U_{2j}$$

$$(j = 1, 2, \dots, M)$$

在這些迴歸公式中， P_{AK} 與 P_{AD} 分別為三個迴歸式的截距（intercept），而括弧中的數值則為斜率（slope）。括弧中的機率 P_{iK} （ $i = K, D, N, O$ ）、 P_{iD} （ $i = K, D, N, O$ ），則可以由截距加上斜率之估計值求得。在分裂投票率中雖然各里之間有所差異，但在各里之內大致一致的假定之下，我們可以藉由總體資料來推論表中個體層次的投票情況（Achen and Shively 1995, 37）。經由上述的方式，本研究將初步估計表中每個細格的機率，以瞭解台北市選民的投票支持的傾向，分析各里的選民分裂投票模型之比例。

不過，由於古德曼模型（Goodman model）及其延伸的推論方法，假定分裂投票率「因總體單位之間而異，但在各個總體單位之內則大致一致」，此與實際總體單位情況常有出入，故在實際使用上很容易產生不合邏輯的估計值（如機率超過1或是低於0）（Achen and Shively 1995, 15）以及可能產生較大的標準誤（standard errors）。同時若是沒有對不同的總體單位進行加權（weight），將會造成較小的選區過度推估分裂投票的比例（Burden and Kimball 1998）。

針對此問題，King（1997）提出區位推論模型解決以上的問題，比起上述的 Simple Goodman model，做了一些的改進，將傳統的上下限法（Method of Bounds）納入模型之中，以各總體觀察單位所計算出的參數上、下限，作為統計估計的基本數據，如此更充分的運用了觀察值中確定的資訊；同時設定參數之多變數機率分佈為介於0與1之間的截斷式雙變數常態分佈，可以避免參數估計值大於1或是小於0的不合理機率，以及避免個體資料集結成總體數據所可能產生的偏誤（aggregation bias）；同時也放寬了 Simple Goodman model 中過嚴的假定，除可估計母群參數的（加權）平均值，亦可相當精確地估計各總體觀察單位內之參數值（King 1997, 91；張益超 1999, 26-27）。

因此本研究將先進行傳統的初探分析，然後呈現 Simple Goodman model 的母群參數估計值，再加以運用 King 的區位推論模型，估計八十七年台北市選舉各里各投票模式的比例，檢驗上述之待驗假設。

伍、初探分析

此次台北市三合一選舉的結果顯示（表3），國民黨籍的市長候選人獲得的支持比例為51.13%，而在市議員選舉部分國民黨獲得的支持比例則為40.64%，這可看出國民黨兩項選舉得票率相差有10.49%。再者，民進黨籍市長候選人的支持比例為45.91%，市議員選舉部分民進黨的支持比例則為33.82%，這亦表示民進黨兩項公職選舉得票率差距有11.43%。更值得注意的是，新黨籍市議員得票比例，較新黨市長候選人多出了18.28%。

表3 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選舉及市議員選舉各黨之得票數與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與市長得票率之差距
市長選舉	馬英九（國民黨）	766,377	51.13 %	-----
	陳水扁（民進黨）	688,072	45.91 %	-----
	王建煊（新黨）	44,452	2.97 %	-----
市議員選舉	國民黨候選人	596,915	40.64 %	-10.49 %
	民進黨候選人	496,754	33.82 %	-12.09 %
	新黨候選人	312,013	21.25 %	+ 18.28 %
	其他候選人	62,946	4.29 %	-----

根據以往直覺上的比較，得票越接近，一致投票的比例越高，反之差距越大則分裂投票比例越高。但如此的推論有可能產生區位謬誤，難道國民黨市議員的支持者全部都支持國民黨市長候選人，而市長得票率多出的10.49%都來自新黨市議員的支持者嗎？答案是未必，因為若依照嚴謹之上、下限法（Method of Bounds）的推算（Duncan and Davis 1953），此次台北市長選舉與市議員選舉，全市國民黨一致投票數及分裂投票都是介於0票與596,915票之間，換言之，國民黨實際一致與分裂投票率在0%與100%之間都有可能；民進黨依上、下限法推算之一致與分裂投票率也是介於0%與100%之間，唯有新黨依上、下限法可推算其分裂投票數介於267,561票與312,013票之間，也就是新黨之分裂投票率介於85.75%與100%之間。換句話說，就全台北市的總票數來觀察，我們充其量也只能說：全市至少有267,561票分裂，至多則有1,405,682票分裂。綜觀上述上、下限值的計算，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分裂投票數或是分裂投票率的推算結果，對於我們瞭解一致投票與分裂投票，作用實在有限，不過這卻也警告我們僅憑直覺臆測可能產

生的謬誤。

就表3所呈現全台北市之市長選舉以及市議員選舉各政黨總得票率，用於解釋一致投票與分裂投票的情形似乎太過於籠統，而且易於產生推論謬誤，因此若是能夠以全台北市435個里為分析單位，比較各政黨在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中的得票率，應較能夠觀察出兩種公職選舉的關係。在本研究中必須同時比較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等多黨選舉之得票率，以往傳統上使用二維（two-dimensional）座標、二個面向解釋政黨得票率，顯然無法完整瞭解各政黨選舉結果之關係，所以部分學者建議採用三個維之座標系，稱之為三角圖（ternary diagram）用以呈現多黨選舉的關係（Katz and King 1999, 18-19；黃紀與張益超 2000, 9）。

不過，吾人若將全市435個里之各黨得票率放置於同一張三角圖上，會因過於擁擠而不易發現在兩項公職選舉上各黨得票率之關係，同時為了檢視各選區選民投票是否有差異，故本研究乃針對市議員六個選舉區，逐一觀察各黨在各里兩項公職得票率之關係，這六張三角圖分別呈現於附圖之圖1、圖5、圖9、圖13、圖17、圖21。例如圖一即代表市議員第一選區，圖中之小三角形代表國民黨、民進黨以及新黨之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在三維上的交會點，而小圓圈則表示這三個政黨的市長候選人得票率；為標明兩項公職選舉之各黨得票率的關係，故同一個里別用箭頭相連接。另外，在每一張三角圖上運用 Y 字型區劃出三個政黨的得票地盤，若是靠近頂端為投給國民黨比例較高的里，靠近左下角則為新黨地盤，同理可知右下角為民進黨得票率較高的里，也就是民進黨的地盤。

首先我們可以判斷出不同選區各政黨得票的情況，例如圖一顯示市議員第一選區，大多數的里在市議員選舉方面為國民黨的地盤，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若同一個里的市長得票率與市議員得票率用箭頭相互連結後，會發現在國民黨市議員選舉地盤中，卻有部份的里在市長選舉方面倒向民進黨市長候選人；換言之，同一里相互連結的箭頭若是由左上往右下，便表示可能這些里的部份選民採取了 KD 型分裂投票。

第二，在本次研究焦點上，新黨市議員支持者是否會在市長選舉轉而支持馬英九，若是選民採取 NK 型分裂投票，圖上的箭頭應該由新黨市議員之政治地盤（三角圖之左下角）向右上角國民黨政治地盤連結，亦即箭頭與國民黨之左軸平行。就圖一而言，雖無明顯趨勢顯示此一模式，但仍可看出市議員得票接近新黨政治地盤的里，其線型是呈現由左下向右上連結，故 NK 型分裂投票的情形似乎存在於部份的里。以上顯示出的結果，一方面看出各里之間共通的投票模式，另一方面也發現里與里之間是有些差異。

由附圖17的圖形亦顯示出在市議員第二選區中，大部分的里產生 NK 型分裂投票模式，箭頭是左下至右上，尤其在新黨市議員得票率較高的里，國民黨市長候選人的得票

率也較高。不過仍有部分的里顯現出 KD 型分裂投票模式，選民在市長選舉轉而支持陳水扁，在這些可能有 KD 型分裂投票情形的里，市議員得票率方面則大多為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各半、相互對決的情況。在圖9、圖13、圖17、圖21漸漸的呈現出 NK 型分裂投票模式，在市議員選舉新黨得票率越高的里其 NK 型分裂的情況相當嚴重，以圖21來說，可看出市議員第六選區為新黨之政治地盤，市議員得票率較其他兩黨為高，三黨得票率交會點大多落在左下角，但若與同一里市長得票率相連結則發現，箭頭的走勢大多呈左下至右上，國民黨馬英九得票率較其他兩位候選人高，與一般印象新黨選民分裂投票會相當嚴重若合符節。

以上是以圖形及箭頭作直覺式的觀察比較，仍有些許研究的缺點，例如里雖然是較小的集體單位，但僅比較各黨在里的得票率，仍有區位謬誤之風險；何況我們仍不知各里 NK 型分裂投票的比例為何。

陸、Simple Goodman Model 之估計

由於上述的限制及推論時可能的謬誤，因此傳統的區位推論多運用古德曼模型作為分析的工具，計算出各種投票模式的比例。本研究的焦點在於估計出選民在市議員選舉支持某一政黨，而卻在市長候選人支持另一政黨的比例，則依照古德曼模型的設定，以市長選舉三個政黨在各地之得票率為依變數，各政黨市議員選舉在各地之得票率為自變數，進行線性迴歸，分析出的結果列於表4。然後將估計出的迴歸係數再與截距相加後，即是表3-2所列台北市市長選舉及市議員選舉一致與分裂投票的機率，將其計算後結果與表2結合呈現於表5中。

表4 古德曼模型估計值表

			依變數	
			市長選舉	
			國民黨得票率	民進黨得票率
自變數	市議員選舉	截距	0.139 (0.032)	-0.105
		國 民 黨 得 票 率	0.432 (0.013)	0.528 (0.013)
		民 進 黨 得 票 率	-0.059 (0.015)	1.038 (0.015)
		新 黨 得 票 率	0.845 (0.018)	0.051 (0.018)
		其 他	0.345 (0.051)	0.571 (0.052)
			R ² = 0.996 N = 435	R ² = 0.995 N = 435

表5 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一致投票率與分裂投票率之古德曼區位迴歸估計值

		市 長 選 舉		
		國民黨	民進黨	新 黨
市議員選舉	國 民 黨	P _{KK} = 0.571	P _{KD} = 0.423	P _{KN} = 1 - P _{KK} - P _{KD} = 0.006
	民 進 黨	P _{DK} = 0.080	P _{DD} = 0.933	P _{KN} = 1 - P _{DK} - P _{DD} = -0.013
	新 黨	P _{NK} = 0.984	P _{ND} = -0.054	P _{KN} = 1 - P _{NK} - P _{ND} = 0.070
	其 他	P _{OK} = 0.484	P _{OD} = 0.466	P _{KN} = 1 - P _{OK} - P _{OD} = 0.050
	棄 權	P _{AK} = 0.139	P _{AD} = -0.105	P _{KN} 1 - P _{AK} - P _{AD} = 0.966

由表5估計出一致與分裂投票估計值顯示，就整體而言，市議員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的選民，大約有57.1%把選票投給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仍有42.3%的國民黨市議員支持者，在市長選舉時轉而支持民進黨的陳水扁，這一類型分裂投票模式值得深入探討；比較之下，支持民進黨市議員候選人的選民，卻僅僅約有8%把票投給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而民進黨支持者的一致投票比例相當高，有93.3%；另外有趣的是，支持新黨市議員候選人的選民，有高達98.4%支持國民黨市長候選人馬英九。此外，吾人可以看出市議員支持三個主要政黨之外的候選人的選民，約有48.4%支持國民黨市長候選人，

46.6%支持民進黨陳水扁，因此可以說國民兩大黨的對決似乎也瓜分了大多數的非三大黨市議員支持者。

從古德曼模型估計之結果得知，新黨市議員支持者有相當高的比例分裂投票給馬英九，同時也可看出有超過四成的國民黨支持者，分裂投票給陳水扁。若是將古德曼模型分析結果與表4投開票紀錄相互比較，可以得知國民黨市議員得票率與國民黨市長得票率之間的差距，有可能是民進黨支持者分裂投票給馬英九，並且兩者之差距，亦可能來自於新黨市議員支持者分裂投票，使得國民黨市長得票率多過於國民黨市議員得票率。另外對於民進黨市議員得票率與民進黨市長得票率之差距，由古德曼模型分析結果中得知有可能來自於國民黨市議員支持者分裂投票，在市長選舉支持民進黨市長候選人。

不過古德曼模型的估計值存有相當大的疑問與缺失，機率的數值理應介於0與1之間，卻發現新黨市議員候選人的支持者有-5.4%把票投給民進黨的陳水扁；而在市議員選舉棄權的選民，卻有-10.5%把票投給民進黨市長候選人陳水扁。如此不合理的古德曼估計值令人質疑，是一種有偏差的估計值，因此有必要運用較為嚴謹的 King 的 EI 模型進一步的分析。

柒、King EI Mode 估計台北市全市

一致與分裂投票率

全市之一致與分裂投票率，是根據各里之估計值計算而得，但若是將選民數多寡不一的選區等量齊觀，以算數平均數估算總體分裂投票率，會產生所謂的「曼哈頓效應」（Manhattan effect），亦即人口較多的選區的影響力被視為等同於其他人口較少的區域（King 1997，32；Achen and Shively 1995，15）。因此 King 建議以加權平均數進行整體的估算，本研究即採用台北市各里有效票數佔全市總有效票數之比值為權重，計算全台北市之一致與分裂投票率，其結果參見表6。

表6 1998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一致與分裂投票率之 King 區位推論全市估計值

		市 長 選 舉		
		國民黨得票率	民進黨得票率	新黨得票率
市 議 員 選 舉	國民黨得票率	$P_{11}=0.4540$ (0.0339)	$P_{12}=0.4828$ (0.0550)	$1-P_{11}-P_{12}=0.0632$
	民進黨得票率	$P_{21}=0.0432$ (0.0251)	$P_{22}=0.8728$ (0.0277)	$1-P_{21}-P_{22}=0.0840$
	新 黨得票率	$P_{31}=0.9829$ (0.0141)	$P_{32}=0.0082$ (0.0005)	$1-P_{31}-P_{32}=0.0089$

表6之全台北市估計值與古德曼模型推估出的全市估計值比較，吾人可以發現各黨一致投票的機率都沒有古德曼模型估計值高，例如 KK 型一致投票估計值較低於古德曼估計值11.7%、DD 型一致投票估計值則低於古德曼估計值6.02%，另外 NN 型一致投票的估計值則是相差了6.11%。而在各類型分裂投票也有些許差異，例如 DK 型分裂投票的估計值，古德曼模型則較高估出2.718%；在 KD 型分裂投票的估計值，古德曼模型也較為高估了5.98%。不過在 NK 型分裂投票的機率則差異不多。同時整個模型亦沒有出現不合理的估計值，各類一致投票或是分裂投票估計值並沒有出現負值或高於1。

根據表6中一致與分裂投票比例發現，全台北市國民黨的加權一致投票率為45.40%，而全市民進黨的加權一致投票率則高達87.28%。顯然的民進黨在台北市選票的經營有一定的水準，民進黨支持者對於自己政黨的候選人都很支持，這對往後進一步瞭解整個台北市選區民進黨的支持度有一定的幫助。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新黨一致投票的比例則是相當的低（0.89%），似乎可以說新黨的支持者對於市議員與市長選舉有了不同的考量，而且新黨支持者分裂投票的情況比例相當高。以往新黨支持者的具有強烈政黨認同，能夠接受新黨「強制配票」的方式投票，但是似乎僅只於台北市議員選舉，在面臨行政首長選舉時，除非該候選人有較大的當選機會，否則策略投票仍可能發生。

再者，全台北市各類型分裂投票的比例也呈現出一些現象，例如國民黨市議員支持者有48.28%轉而支持民進黨市長候選人，則有6.32%轉向支持新黨市長候選人，看來國民黨市議員支持者較多會支持民進黨的陳水扁，甚至超過了國民黨一致投票率的45.40%，這其中是否意味了民進黨選舉策略奏效，尋求本省籍國民黨支持者轉而支持陳水扁，是一個相當有趣的議題。另外，民進黨市議員支持者分裂投票的比例並不高，但分裂投票給新黨市長候選人的比例則高於投給馬英九的比例；在新黨市議員支持者分裂投票則十分明顯，其中將選票轉支持國民黨馬英九的比例高達98.29%，分裂投票給陳水扁或是一致投票給新黨王建煊的比例卻相當低，而此一現象是否是因為省籍上的因素，值得我們進一步的討論。

上述表6的說明，亦可檢驗前一章所提出的假設。分析出的結果顯示，新黨市議員支持者支持馬英九的比例最高，轉而支持民進黨陳水扁的比例最低，此一結果與假設一所陳述相吻合；但結果亦顯示，在民進黨市議員支持者雖有高比例支持陳水扁，不過轉而支持新黨市長候選人的比例卻高於轉而支持馬英九的比例，此與假設二陳述不符。另外新的發現是，國民黨市議員支持者的選票並不穩定的支持同黨的市長候選人，支持者轉而支持其他政黨候選人的情況將近五成。

捌、結論

本文運用 King 的 EI 模型，跨層次推論分析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選舉以及市議員選舉時，選民在三黨市議員候選人與三黨市長候選人之間的抉擇。結果發現，與外界預期新黨市議員支持者大多採取分裂投票，分裂投票的對象則為國民黨市長候選人馬英九，其分裂投票率高達98.29%。另外，國民黨市議員支持者亦有分裂投票的情形，主要分裂投票對象為民進黨市長候選人陳水扁，分裂投票率為48.28%，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支持者分裂投票率甚至高於國民黨一致投票率，國民黨一致投票率也僅達到45.40%，國民黨市長候選人馬英九似乎不受國民黨市議員支持者的肯定，假若選舉時曾運用所謂「母雞帶小雞」競選策略，欲產生「總統裙帶」效應，似乎此一選舉策略並不奏效。

反觀民進黨市議員支持者之投票傾向，有87.28%的比例支持民進黨籍市長候選人，僅有4.32%的比例轉而支持國民黨市長候選人，民進黨市議員支持者較為忠心的支持同黨市長候選人。

研究分析也如同策略投票理論所推測，「多位候選人單一席次的競爭」之策略投票理論的基礎，在於選舉不確定性與策略思考之間相連結，選民為了避免最不喜歡的候選人當選，有可能將選票投給次喜歡的候選人，而非投給最認同的候選人，如此的投票策略思考是基於「認人不認黨」，選民對選舉結果評估與政黨認同的衝突構成了「策略」的情境，個人因而有可能採取分裂投票的方式，在單一席次的競爭轉而支持其他黨派候選人（徐永明 1999，13），故新黨市議員支持者在市長選舉做了策略選擇，將市長選票轉而支持較有當選希望的馬英九。不過，策略投票理論卻無法解釋國民黨支持者的分裂投票，國民黨與民進黨勢均力敵的市長選舉，國民黨支持者卻支持相互對立的陳水扁則令人匪夷所思。這是否意謂著這一部份的選民對陳水扁過去的施政相當滿意，但又希望能夠有其他政黨市議員在市議會持續的監督，所以將市長選票轉而支持陳水扁；亦或是國民黨內部主流與非主流之爭延燒至市長選舉，造成部份國民黨支持者「棄馬保陳」，以上的選民心理動機無法由此研究得知，有待往後利用民意調查資料進一步檢測。

另外，本研究發現，新黨市議員支持者於本次市長選舉跨越了政黨的界線，在市長選舉轉而支持國民黨的馬英九，而且各里在比例上都相當的高，似乎相當「團結」的分裂給馬英九，這也如一般預料新黨支持者的選票有回流至國民黨的現象。不過更有趣的現象是，國民黨市議員支持者亦採取分裂投票，支持者分裂投票的對象為民進黨的陳水

扁，這類型分裂投票的比例甚至高過於國民黨一致投票的比例，看出國民黨的支持者並沒有一個穩定的政黨認同；相對於高一致投票率的民進黨，民進黨實質地掌握大部分支持者的忠誠。另外，陳水扁的現任優勢、高施政滿意度，為自己的競選鞏固了基本票源，同時也拓展了不少國民黨部份的選民支持；另一方面，國民黨市長選舉的策略，是否在期待著其他政黨的分裂，忽略了本身政黨認同者的經營，這背後原因值得推敲。

此外，若以「選舉結構」、「策略理論」的角度說明分裂投票的原因可以發現，由於我國議員選舉的特殊制度，採行「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各黨可以提名多位議員候選人角逐席次，因此各政黨為求得「席次極大化」會妥善安排各候選人選區與提名候選人的特質，以避免同黨相互爭奪選票；同時也方便於基層組織動員輔選，政黨會劃出黨內候選人的「責任區」，如此「責任區」的分配使選民在面對同黨眾多候選人中，較會選擇與自己地緣關係最密切的候選人以及呼聲較高的候選人。選民可從同黨候選人中做選擇，而失去了策略投票的動因。

反觀我國行政首長的選舉制度為單一席次相對多數投票制。如此的選舉制度往往造成兩位當選呼聲較高的候選人之間對決。這時對於部份認同呼聲較低的候選人之選民會產生一種不確定性，一方面為了不浪費自己的選票，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自己最不喜愛的候選人當選，會將選票「策略」投給次喜歡的候選人，如此跨越了原有的政黨認同界線。由於上述兩種不同選舉結構以及選民選舉策略的考量，有可能產生分裂投票，民國八十七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正好使新黨支持者陷入了投票策略的思考，新黨籍市長候選人當選呼聲不高，因此新黨支持者在面臨次喜歡的選擇時，較認同於政黨理念相似度較高的馬英九，這似乎可解釋選民分裂投票的緣由。

參考書目

I . 中文部份：

中央選舉委員會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庫 <http://www.esc.nccu.edu.tw>

中時電子報 1998年12月6日 <http://www.chinatimes.com.tw/report/98120622.htm>.

中國時報1998年12月6日版17

中國時報1998年12月6日版8

王甫昌

1998 「台灣族群政治的形成及其表現」，載殷海光基金會主編，**民主——轉型？台灣現象**，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143-232。

王業立

1998 **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吳重禮

1998 「美國『分立性政府』與『一致性政府』體制運作之比較與評析」，**政治科學論叢**，9期：61-90。

林佳龍

1988 「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群眾基礎研究：台灣民衆政黨支持的比較分析1983-1986年」，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永泰

1995 「分裂投票：八十三年台北市選舉的實證分析」，**選舉研究**，2卷1期：119-45。

徐永明

1999 「九四、九八台北雙城記：族群政治中少數選擇的分流點」，**台灣政治學會第六屆年會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台灣政治學會主辦。

張益超

1999 「選民投票穩定程度之研究-嘉義市第四屆與第五屆市長選舉之分析」，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連生

1986 「台北市軍眷的政治支持取向及投票動機-以政治文化研究途徑調查分析」，

選舉研究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義彥

1995 「台北市選民的分裂投票分析」，台北市民眾市政意向之研究，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黃紀

1999 南台灣「選舉地緣」之詳實資料庫：1986-2000，八十七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書。

黃紀、張益超

2000 「一致與分裂投票：嘉義市一九九七年市長及立委選舉之分析」，「政治分析的層次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主辦，嘉義民雄。

黃德福

1991 「台灣地區七十八年底選舉分裂投票之初探研究：以台北縣、雲林縣與高雄縣為個案」，*政治學報*，19期：55-80。

戴立安

1999 「陳水扁支持者的族譜初析-以83、87年台北市長選舉相較為例」，八十七年底三合一選舉民意調查學術研討會論文，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主辦，台北。

II. 英文部份：

Achen, Christopher H. and W. Phillips Shively.

1995 *Cross-Level Infer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wn, Kathleen.

1993 "The Logic of Institutional Preferences: German Electoral Law as a Social Choice Outcom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7(4):965-989.

1999 "Voter Responses to Electoral Complexity: Ticket Splitting, Rational Voters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487-505.

Beck, Paul Allen, Lawrence Baum, Aage R. Clausen, and Charles E. Smith.

1992 "Patterns and Sources of Ticket Splitting in Subpresidential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916-28.

Born, Richard.

- 1994 "Split-Ticket Voters, Divided Government, and Fiorina Policy-Balancing Model,"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19:95-115.
- Burden, C. Barry, and David C. Kimball.
- 1998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icket Split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2(3):533-44.
- Campbell, Angus, and Warren E. Miller.
- 1957 "The Motivational Basis of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1:293-312.
- Cox, Gary W.
- 1990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Incentives in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4(4):903-935.
- Cox, Gary W.
- 1994 "Strategic Voting Equilibria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3):608-621.
- Cox, Gary W.
- 1997 *Making Voting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Vries, Walter and Lance Tarrance.
- 1972 *The Ticket-splitter: A New Force in American Politics*. Grand Rapids: Eerdmans.
- Downs, Anthony.
-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Duncan, Dudley, and Beverly Davis.
- 1953 "An Alternative to Ecological Corre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8:665-666.
- Ferejohn, John A. and Randall L. Calvert
- 1984 "Presidential Coattail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8:127-146.
- Fiorina, Morris P.
- 1988 "The Reagan Years: Turning to the Right or Grouping toward the Middle:," *In The Resurgence of Conservatism in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eds. Barry Cooper, Allan Kornberg, and William Mishl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ity Press.

Fiorina, Morris P.

- 1989 *Congress: Keystone of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2ed edi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iorina, Morris P.

- 1992 *Divided Government*. New York: Macmillan.

Frymer, Paul.

- 1994 "Ideological Consensus within Divided Party Govern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9 (Summer): 287-311.

Ingberman, Daniel and John Villani.

- 1993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Divided Government and Party Polar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7: 429-471.

Jacobson, Gary C.

- 1990 *The Electoral Origins of Divided Govern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Katz, Jonathan N. and Gary King.

- 1999 "A Statistical Model for Multiparty Electoral Da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15-32.

Kiewiet, D. Roderick.

- 1983 *Macroeconomics and Micropolitics: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Economic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ng, Gray.

- 1997 *A S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Inference Problem: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 Behavior from Aggregate Dat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ddox, William S. & Dan Nimmo.

- 1981 "In Search of the Ticket-splitte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2: 401-8.

Miller, Warren E.

- 1992 "Generational Changes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Vol. 14: 335-352.

Riker, William H.

- 1982 "The Two-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753-766.

Robinson, W. S.

- 1950 "Ecological Correl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5:351-357.

Rusk, Jerrold Glenn.

- 1970 "The Effect of the Australian Ballot Reform on Split Ticket Voting: 1876-1908,"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4:1220-1238.

Soss, Joe and David T. Canon.

- 1995 "Partisan Divisions and Voting Decisions: U.S. Senators, Governors, and the Rise of a Divided Federal Governmen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48 (2):253-274.

Wattenberg, Martin P.

- 1991 *The Rise of Candidate Centere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註 釋

註 一：在第七屆議員選舉，國民黨原當選20席，陳進棋、陳錦祥、陳玉梅後加入，成為23席；民進黨員當選18席，後李逸洋轉任市府民政局長、廖彬良、林瑞圖遭開除黨籍；新黨原當選11席，後李承龍、龐建國退黨，賈毅然遭開除黨籍。
（中國時報1998.12.6 1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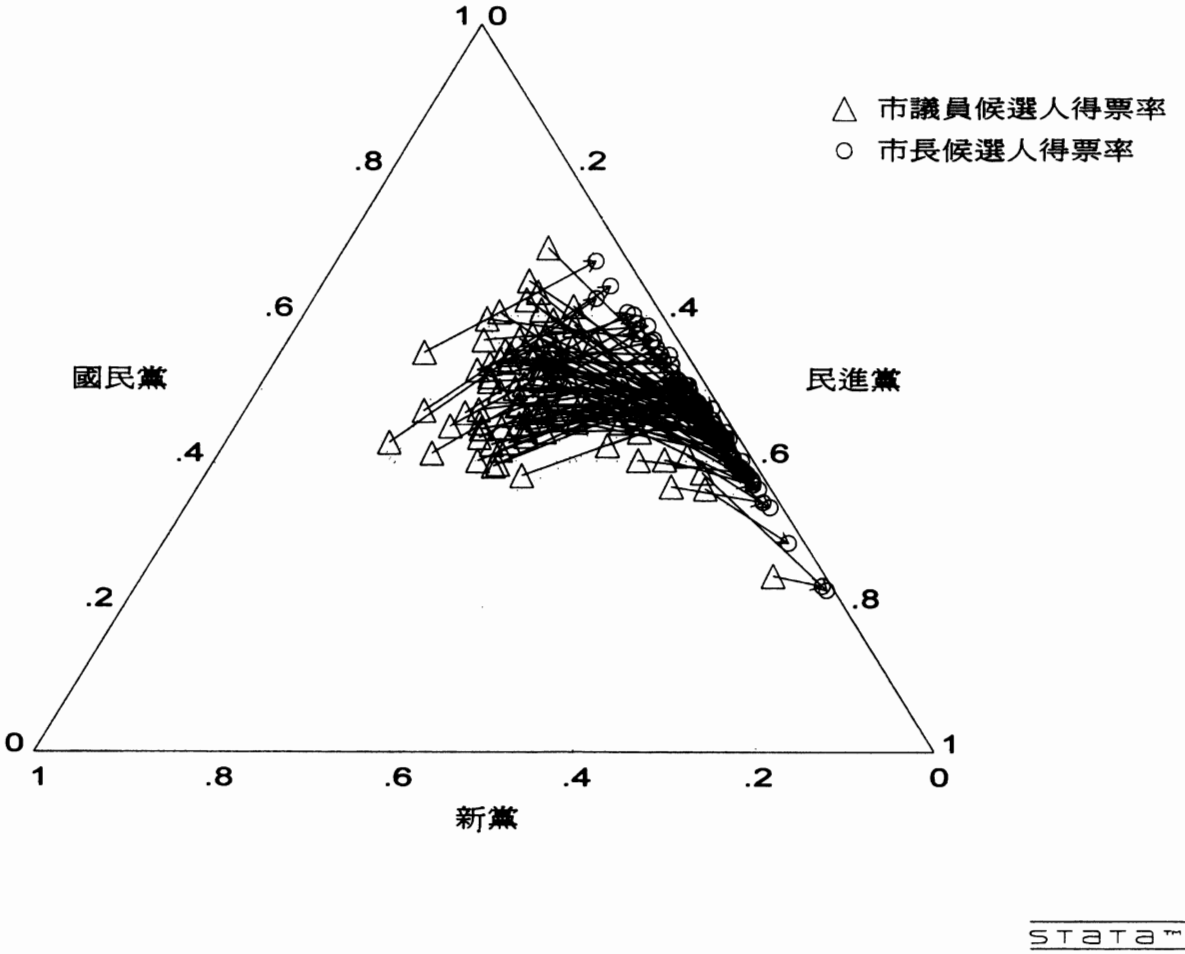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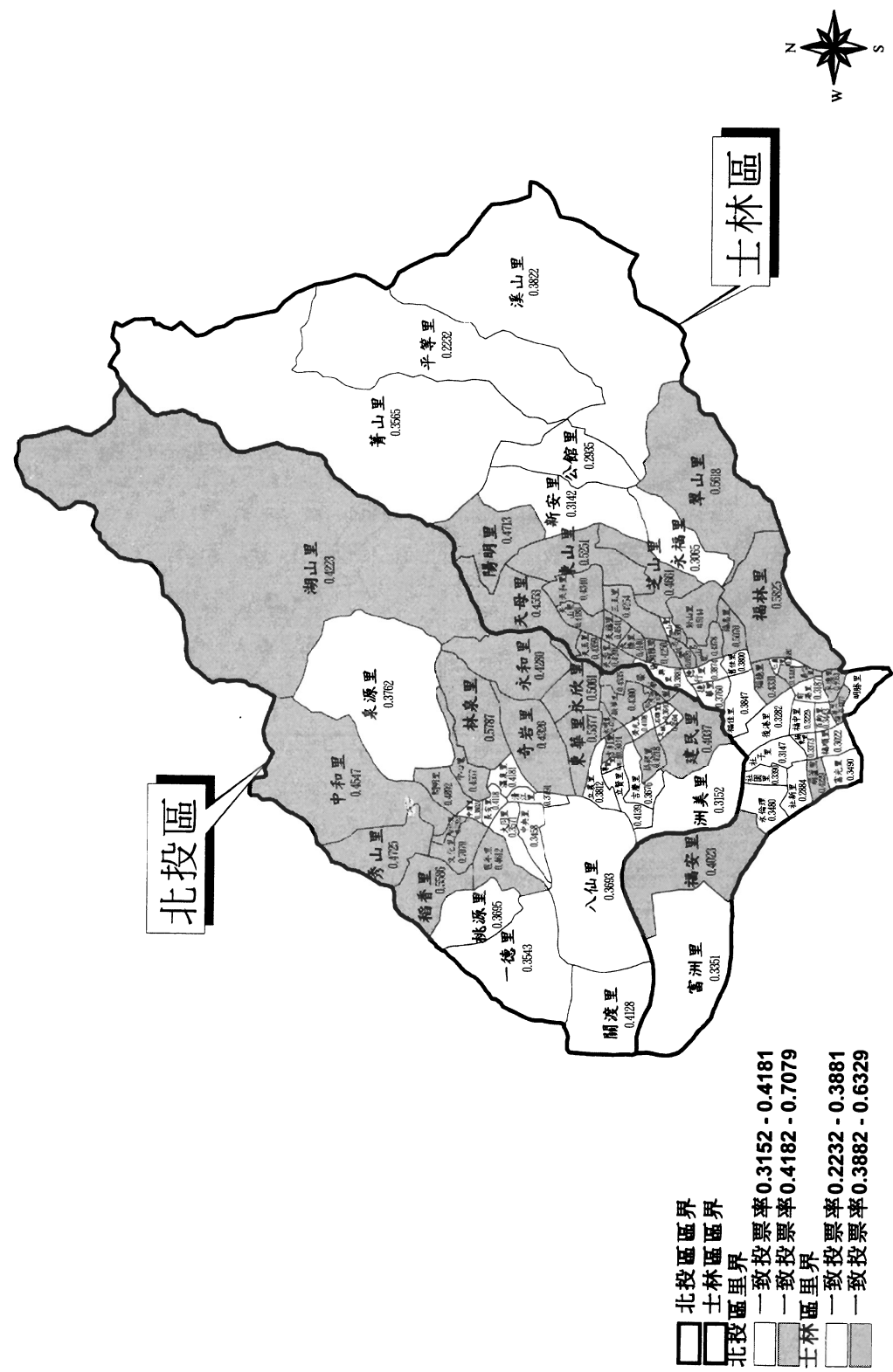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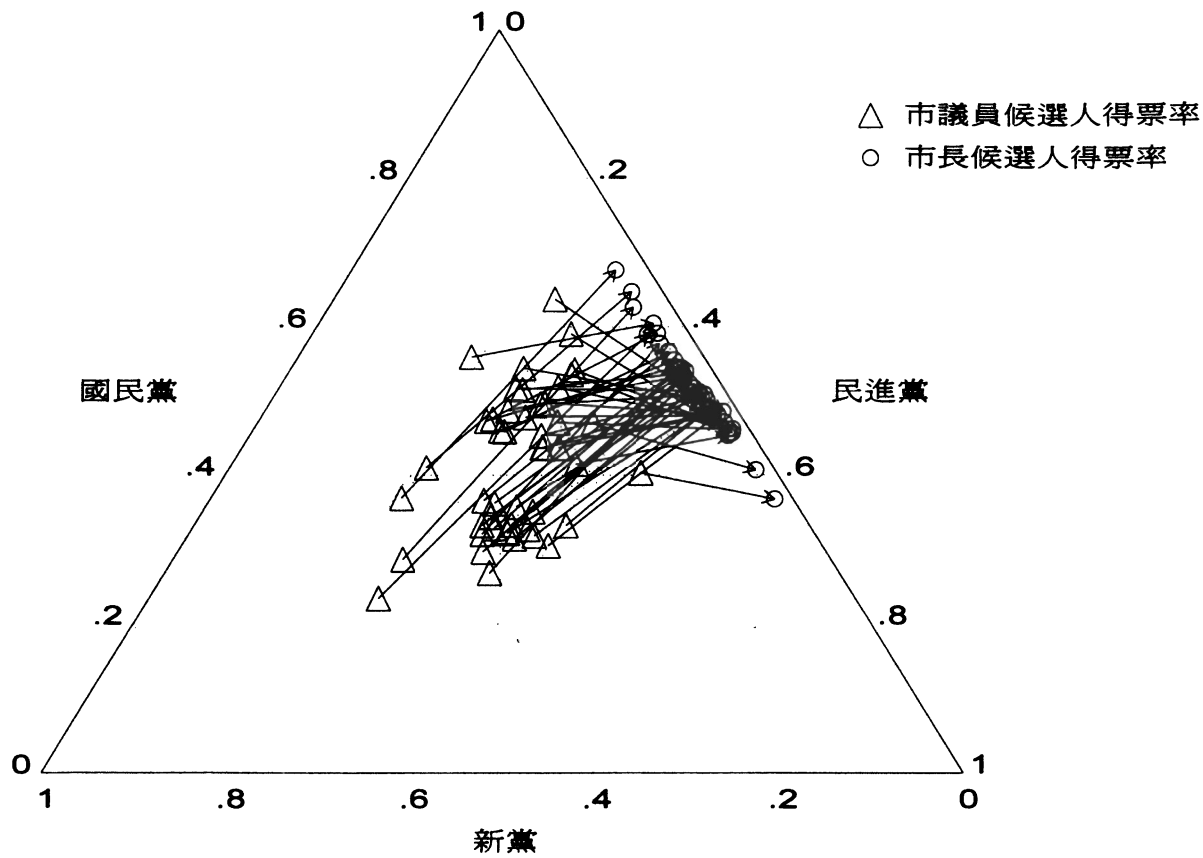


圖1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議員第一選區各里三黨之市長與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分佈





STATA™

圖5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議員第二選區各里三黨之市長與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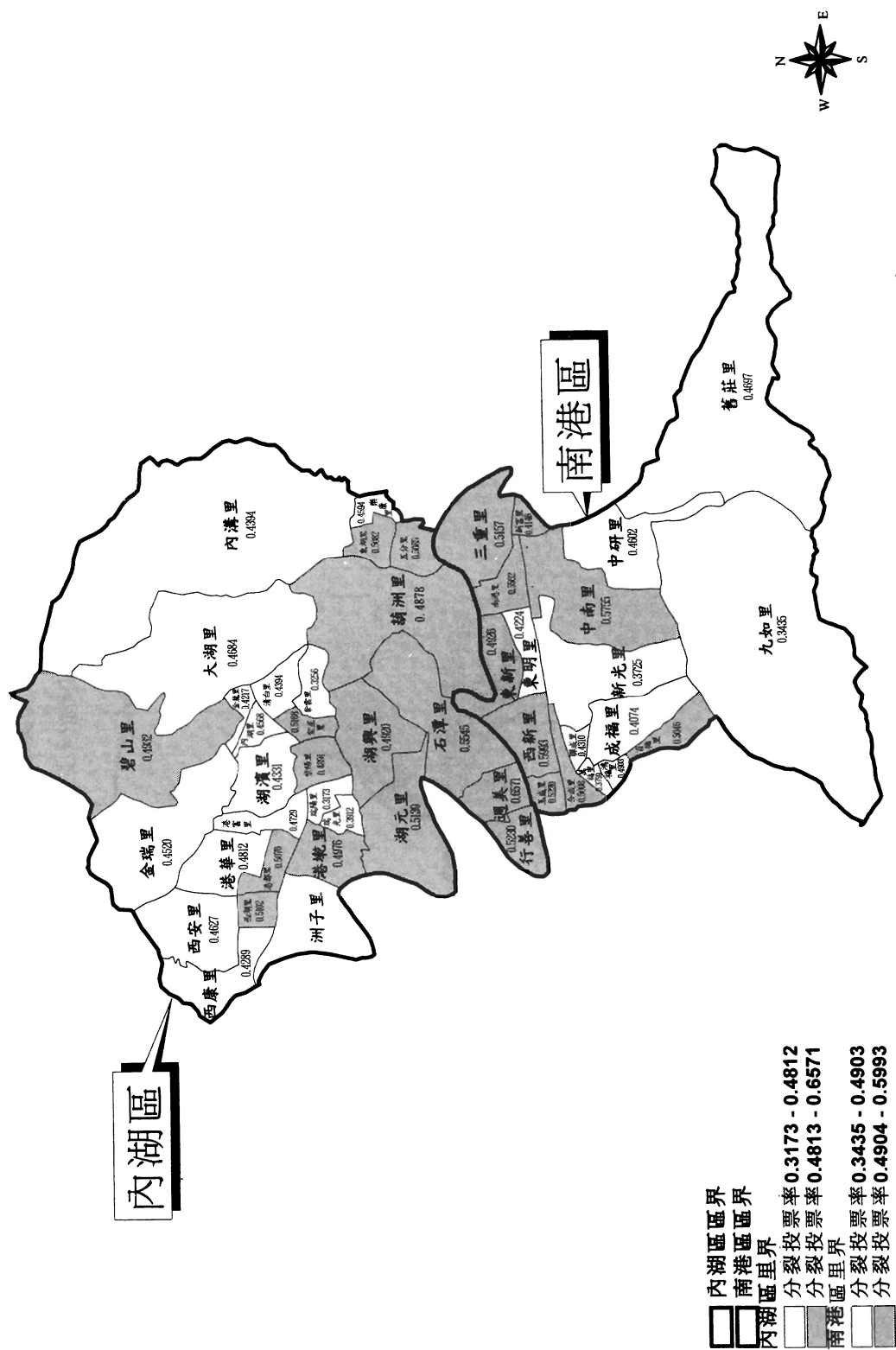


圖7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國民黨之KD型分裂投票率：
市議員第二選區（內湖區、南港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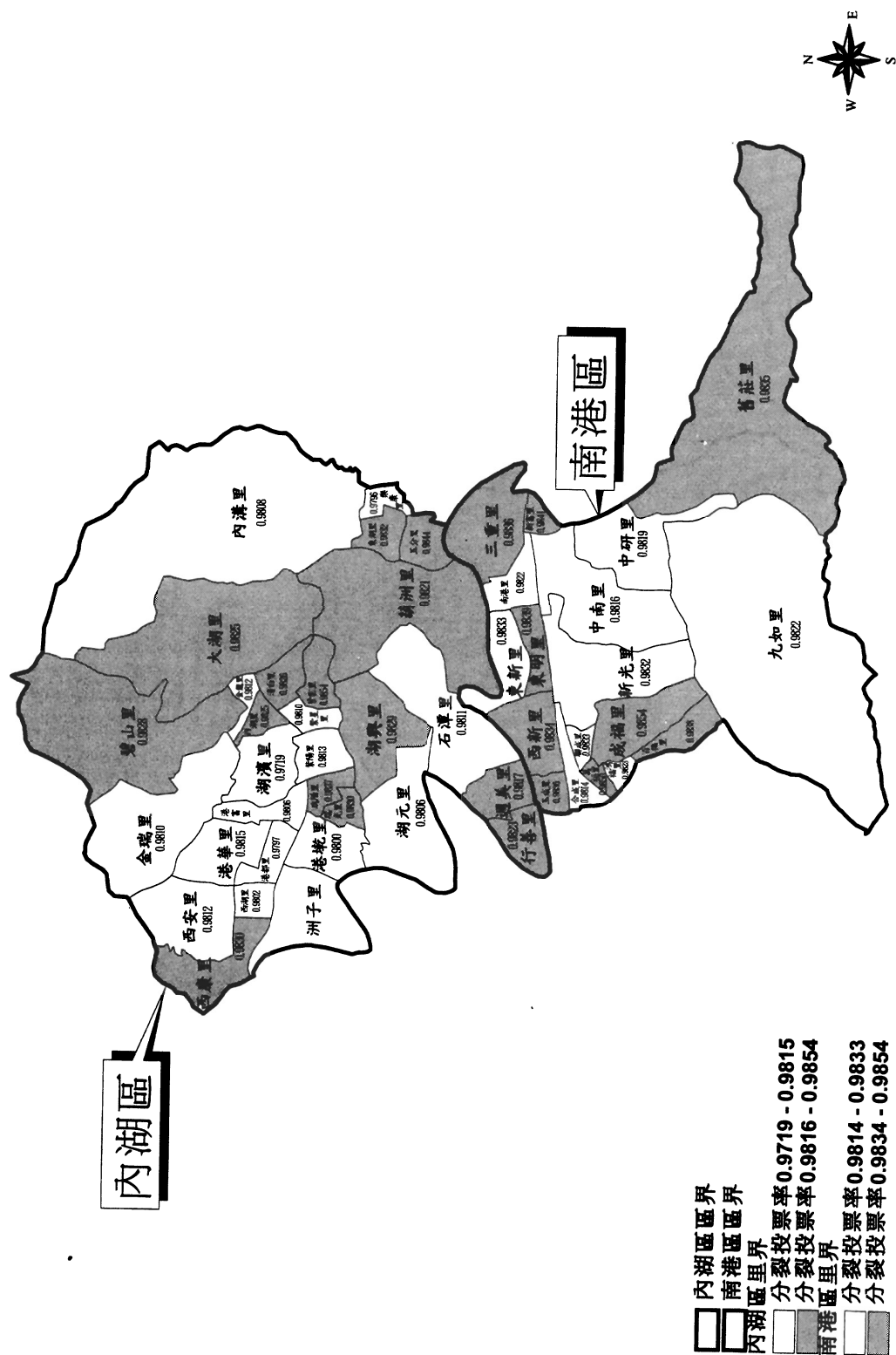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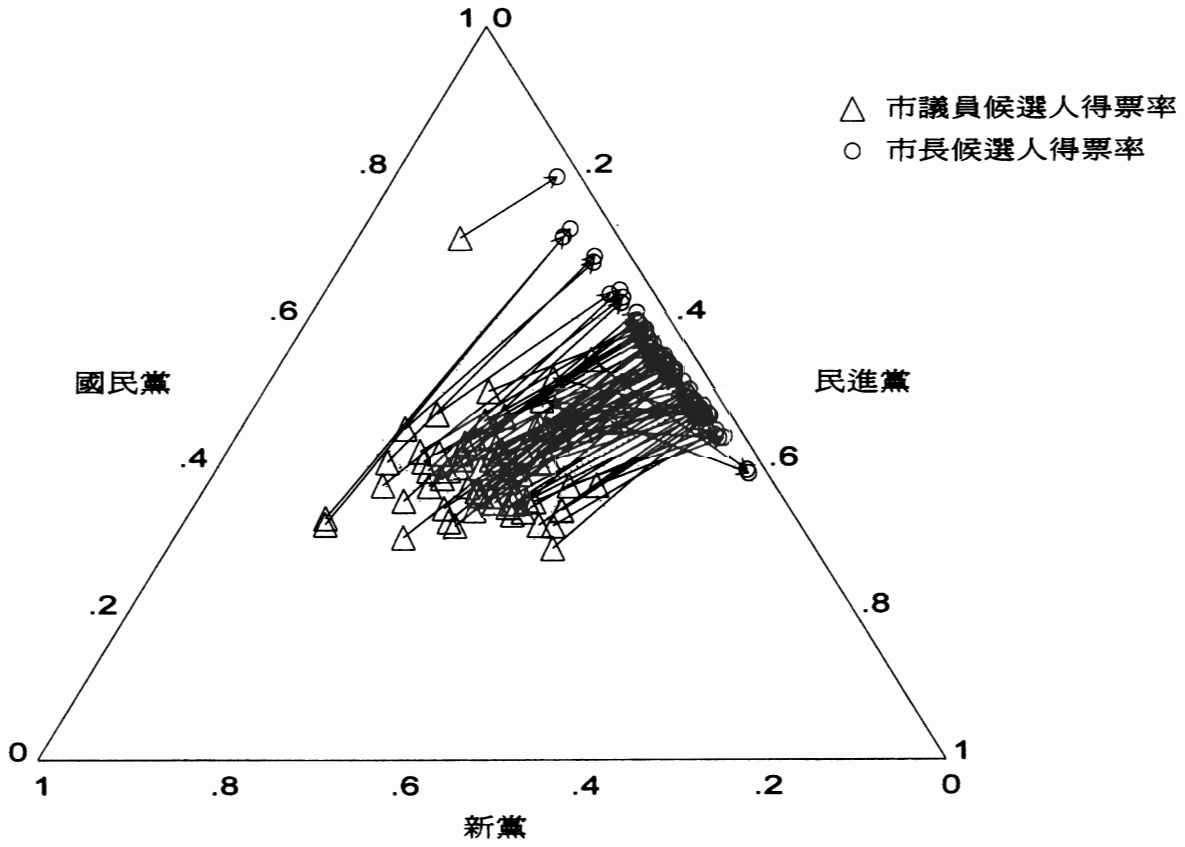


圖8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新黨之NK型分裂投票率：
市議員第二選區（內湖區、南港區）



STATA™

圖9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議員第三選區各里三黨之市長與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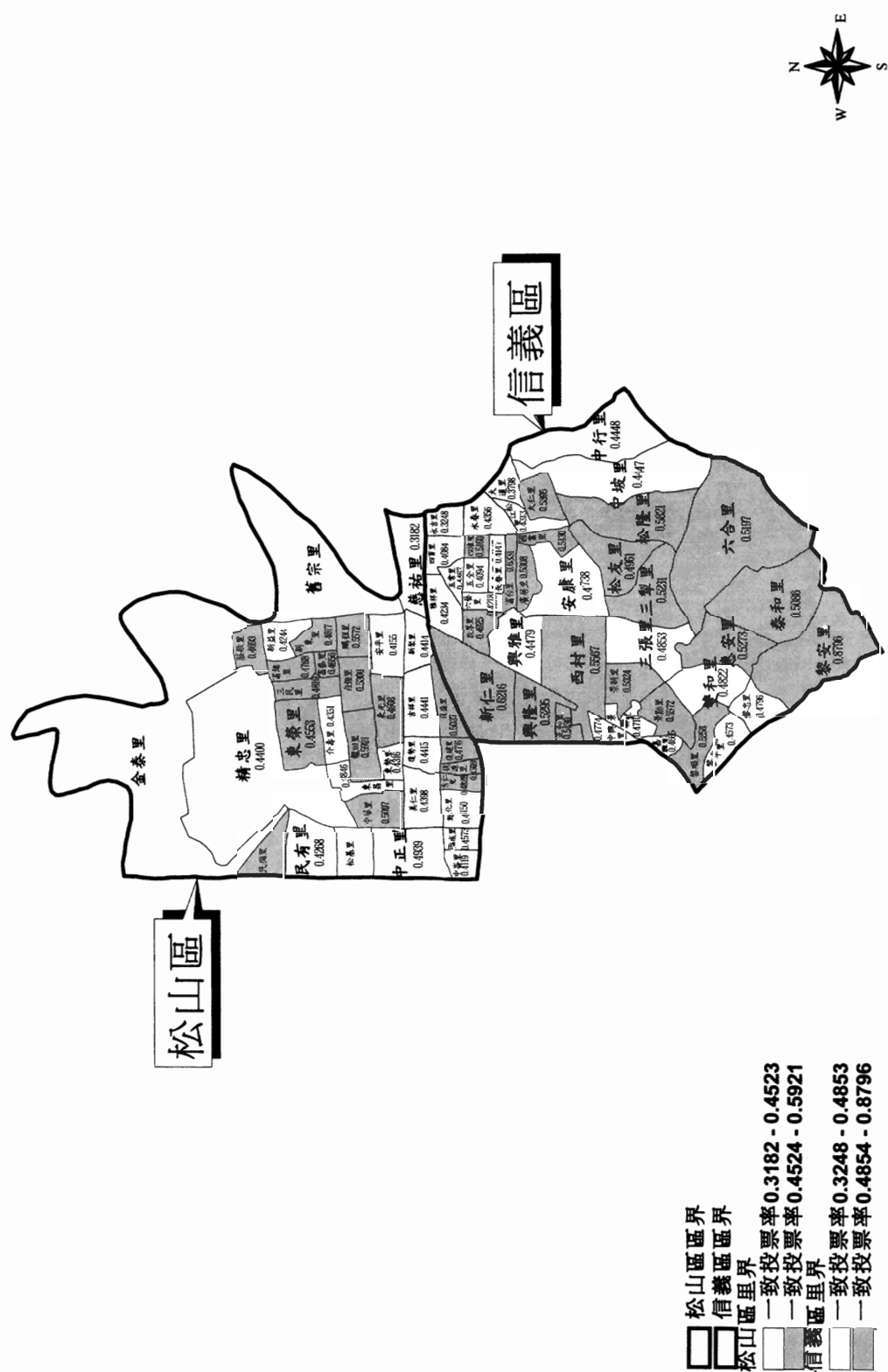


圖10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國民黨之一致投票率：
市議員第三選區（松山區、信義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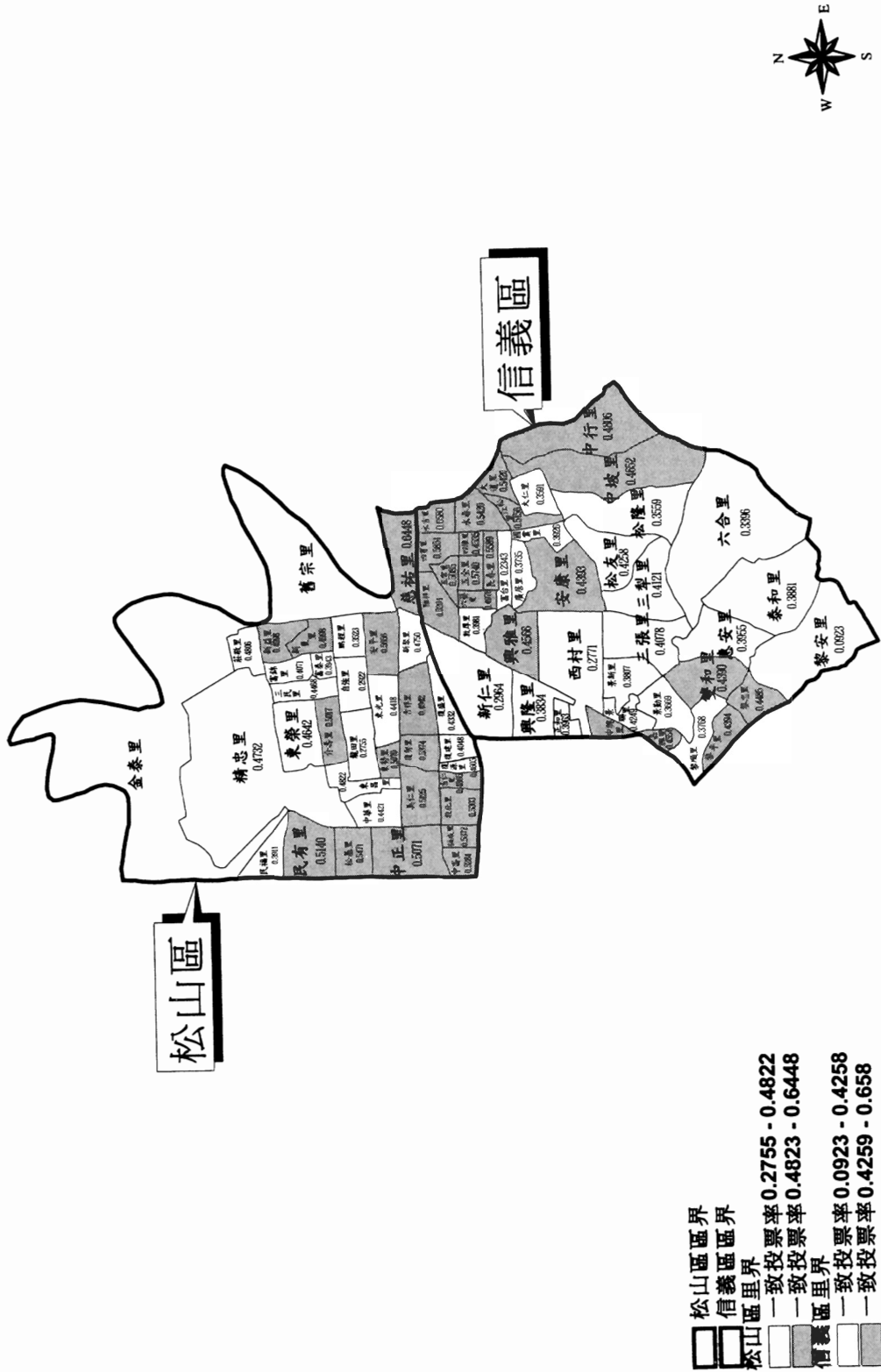


圖11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國民黨之KD型分裂投票率：
市議員第三選區（松山區、信義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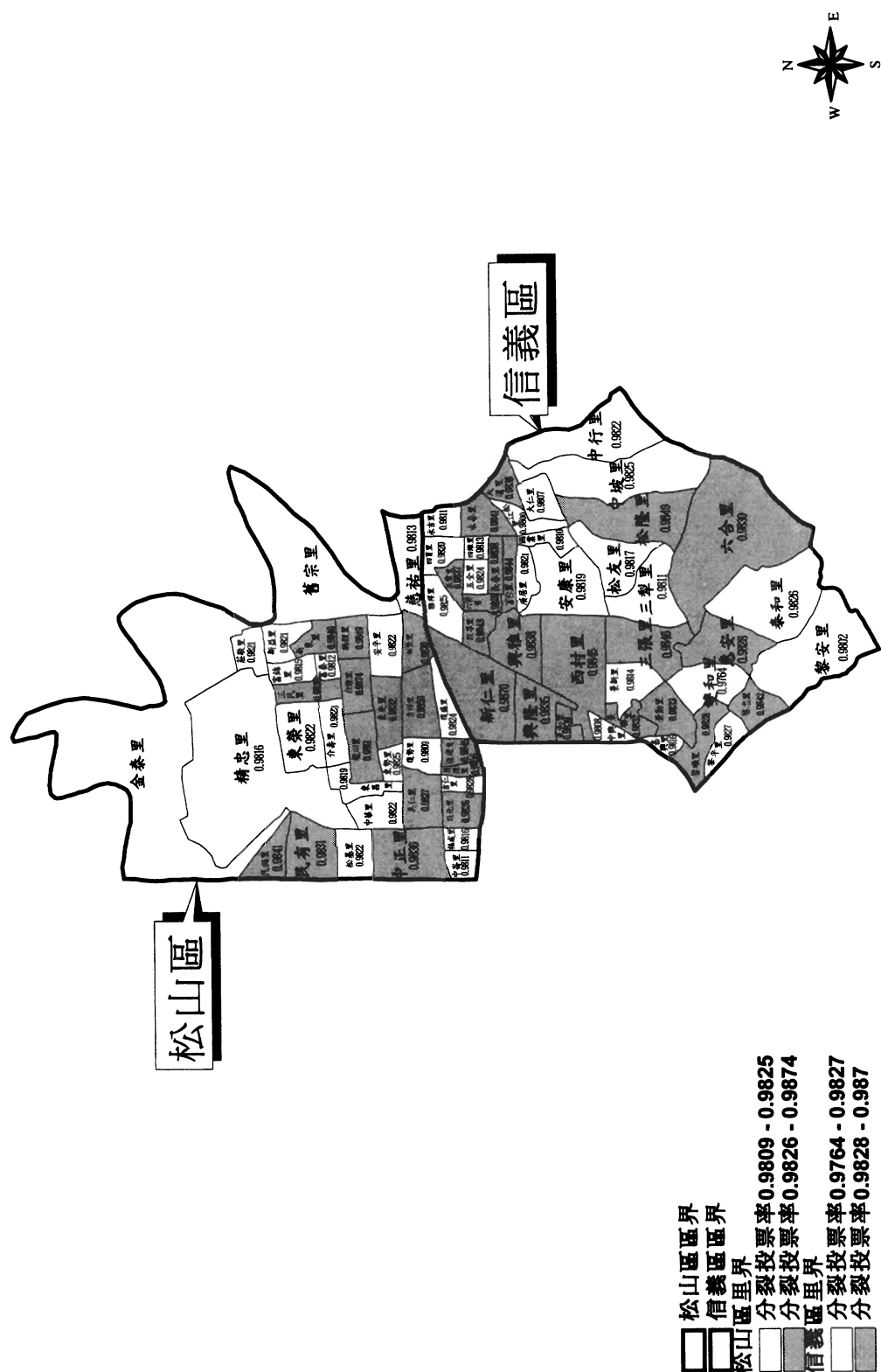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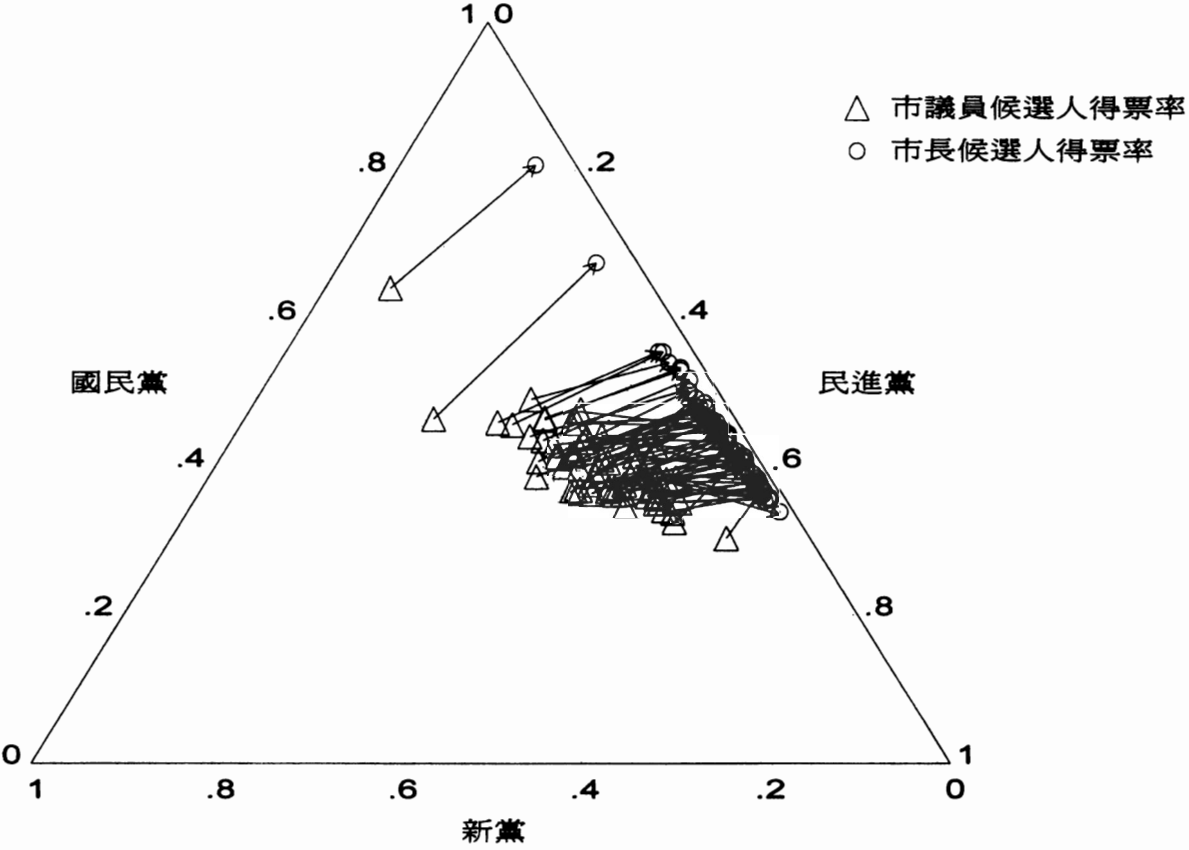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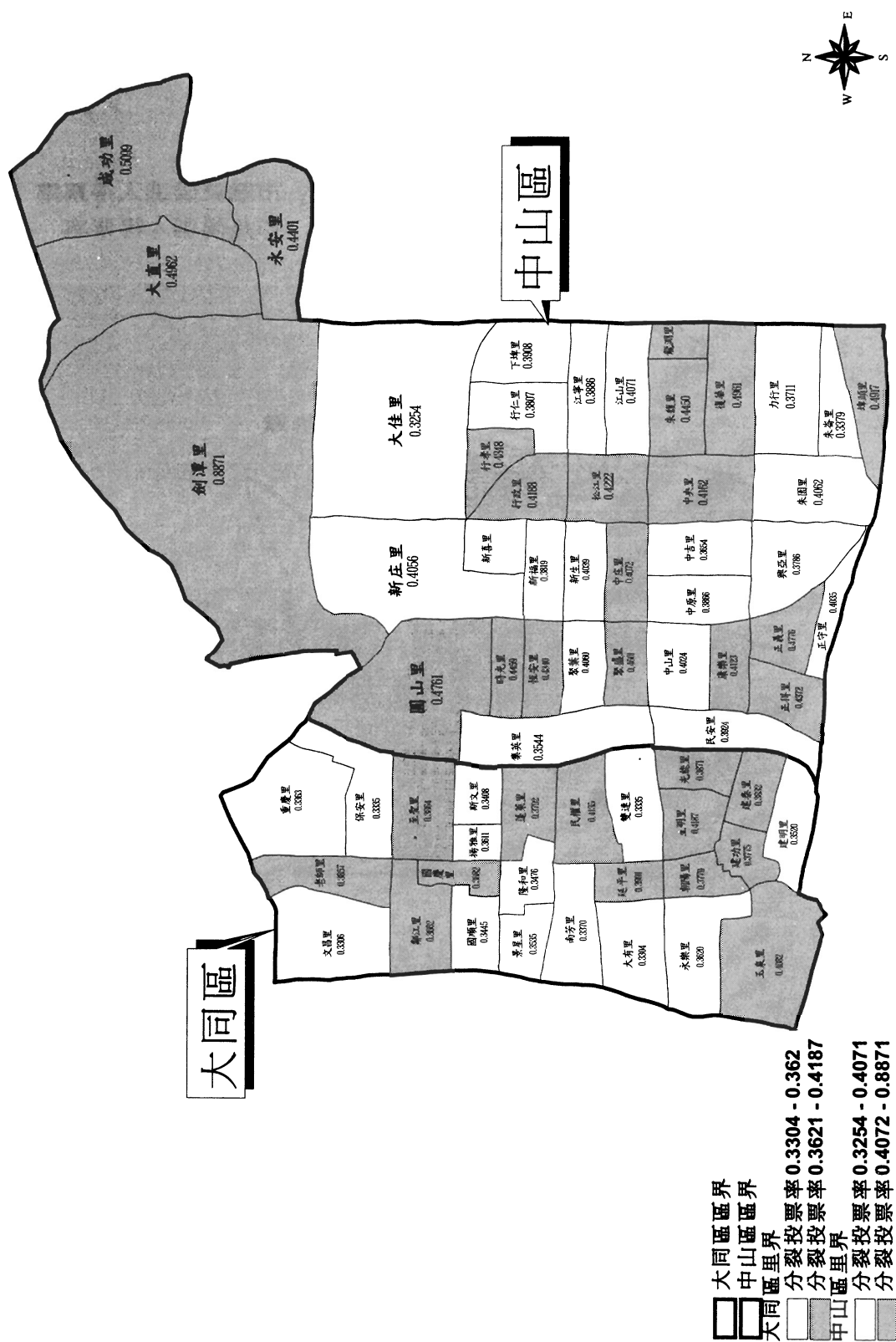


圖12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新黨之NK型分裂投票率：
市議員第三選區（松山區、信義區）



STATA™

圖13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議員第四選區各里三黨之市長與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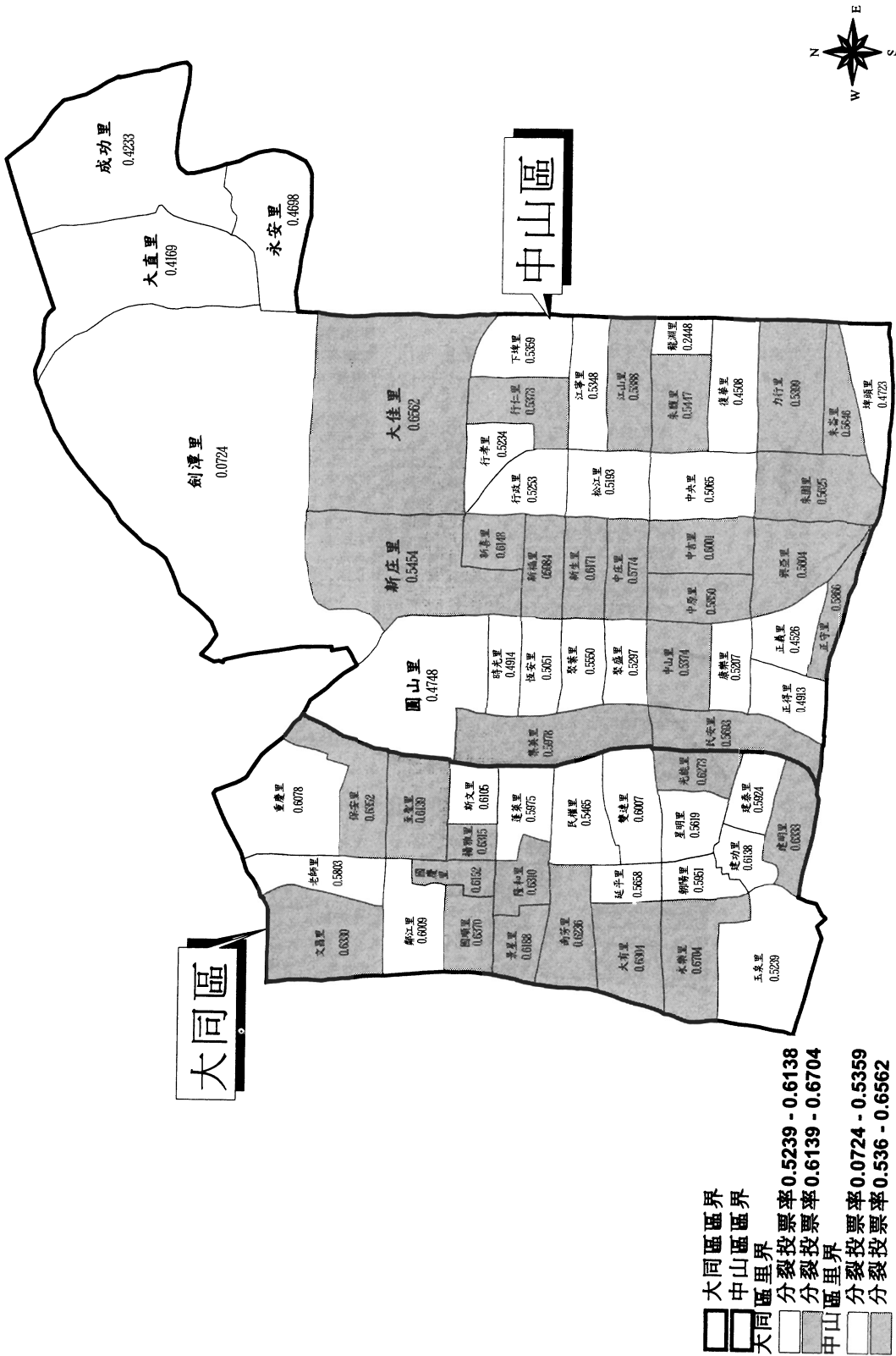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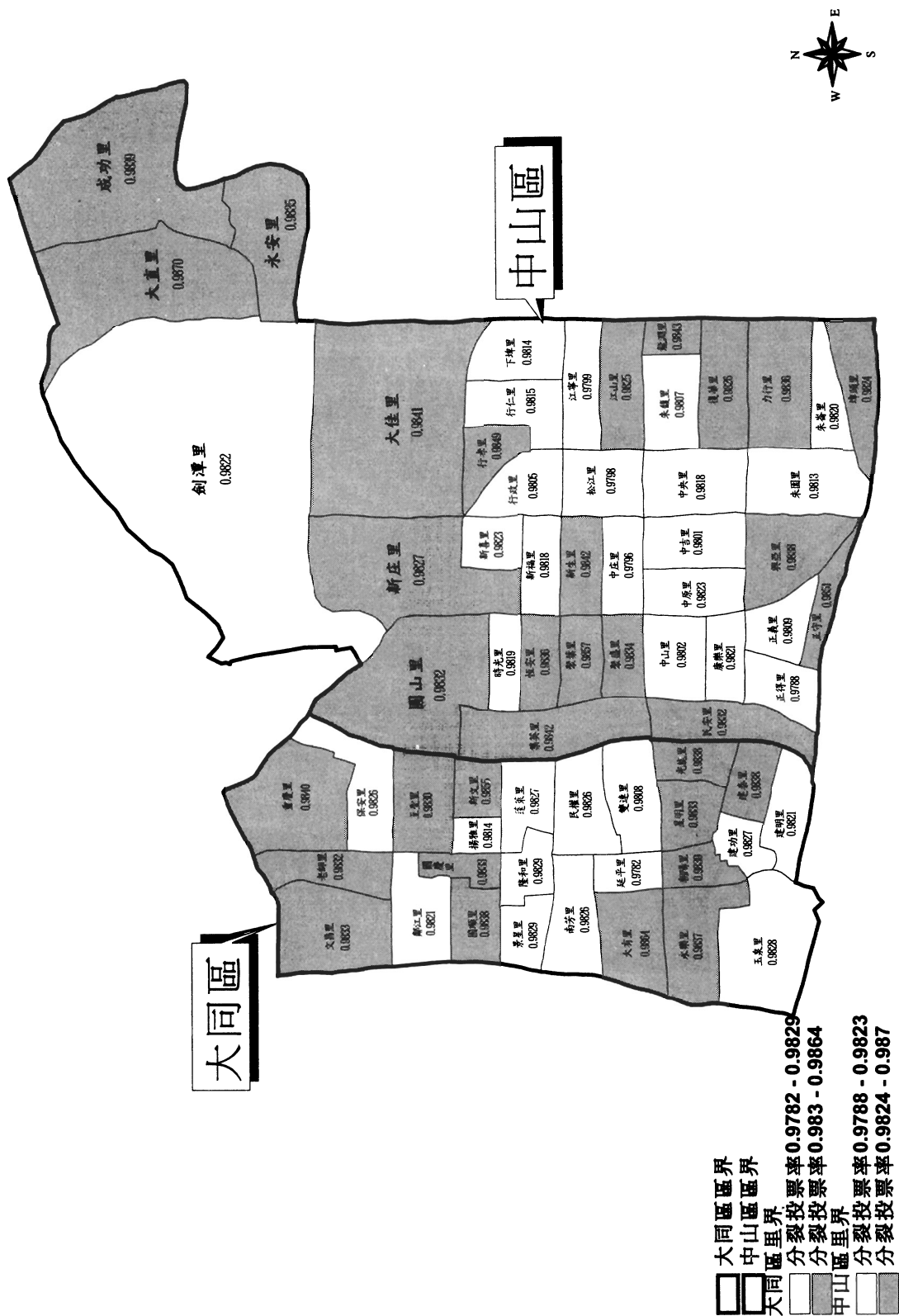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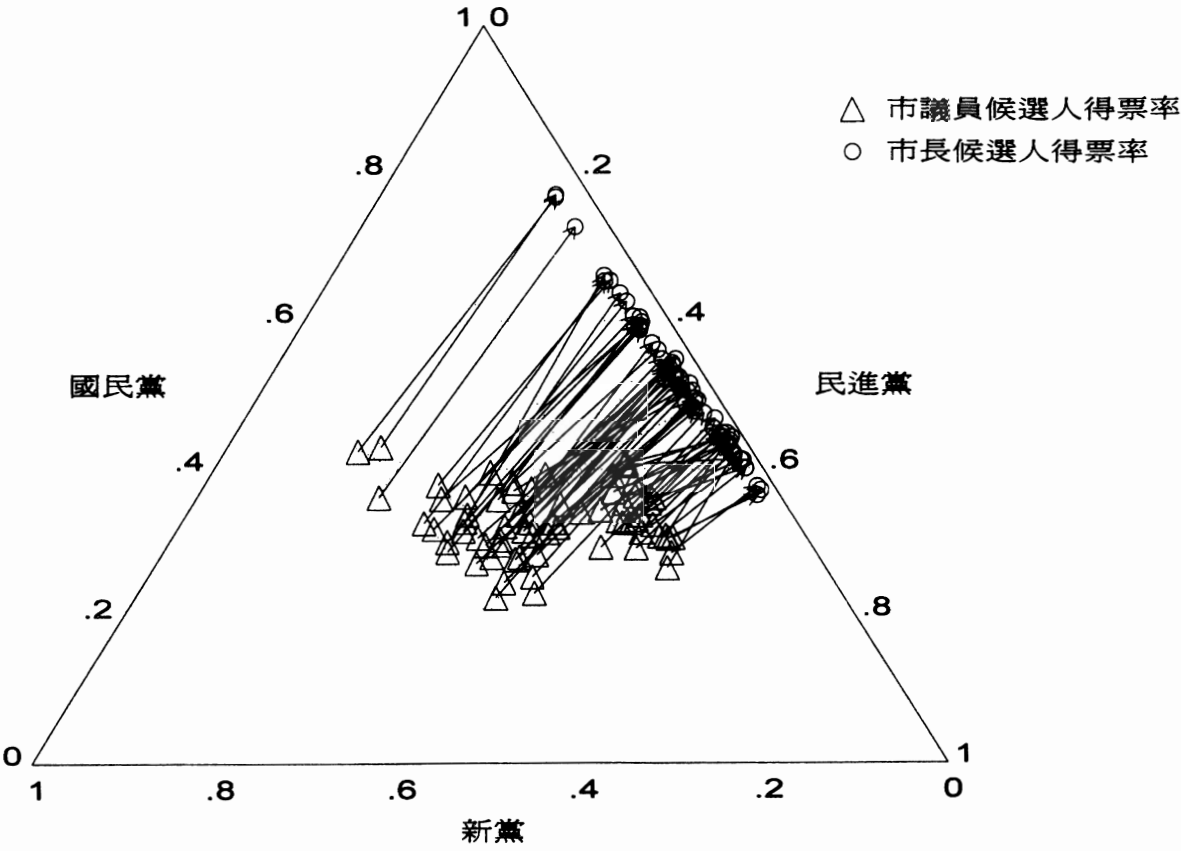


圖15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國民黨之KD型分裂投票率：
市議員第四選區（大同區、中山區）





STATA™

圖17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議員第五選區各里三黨之市長與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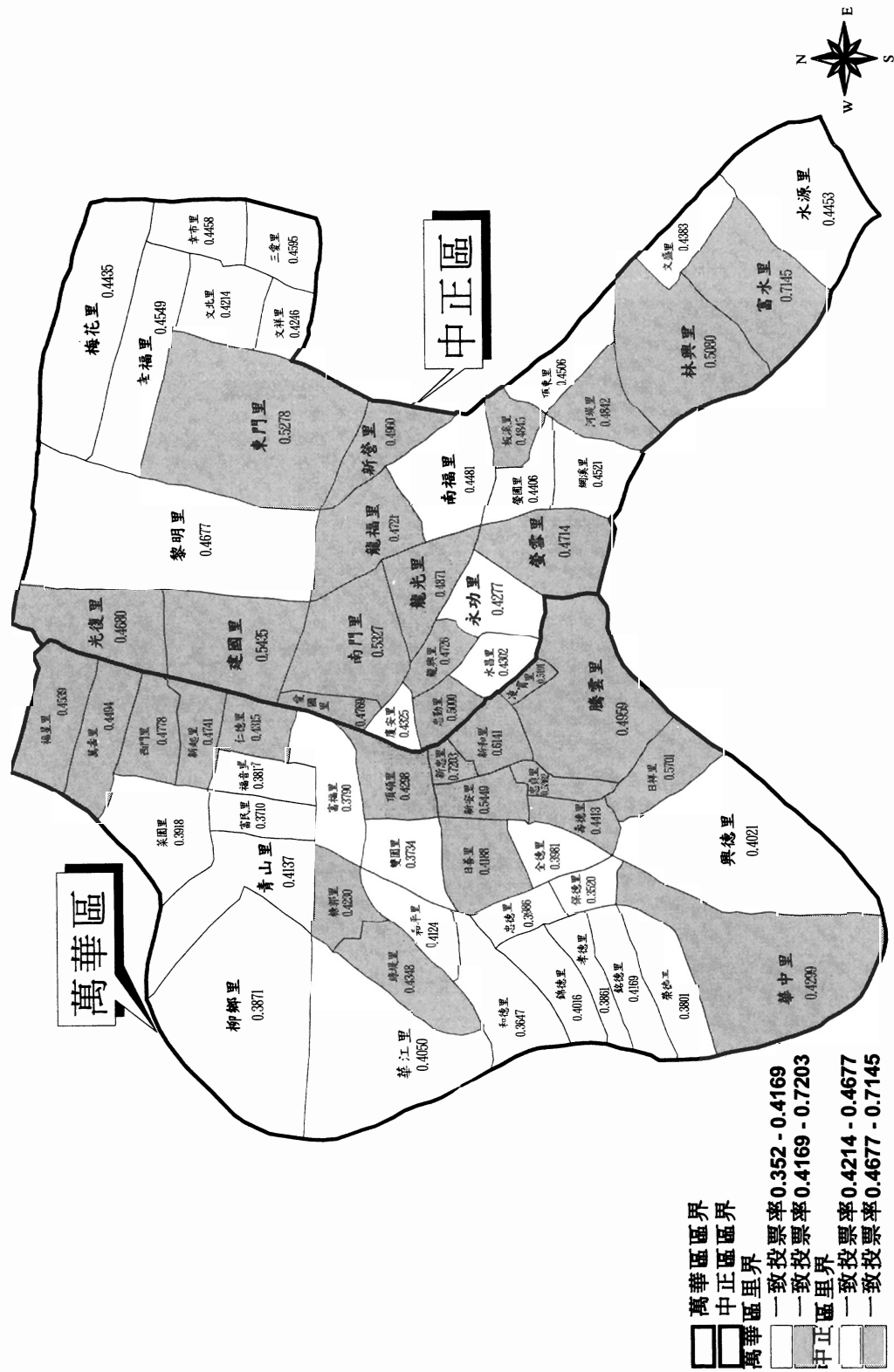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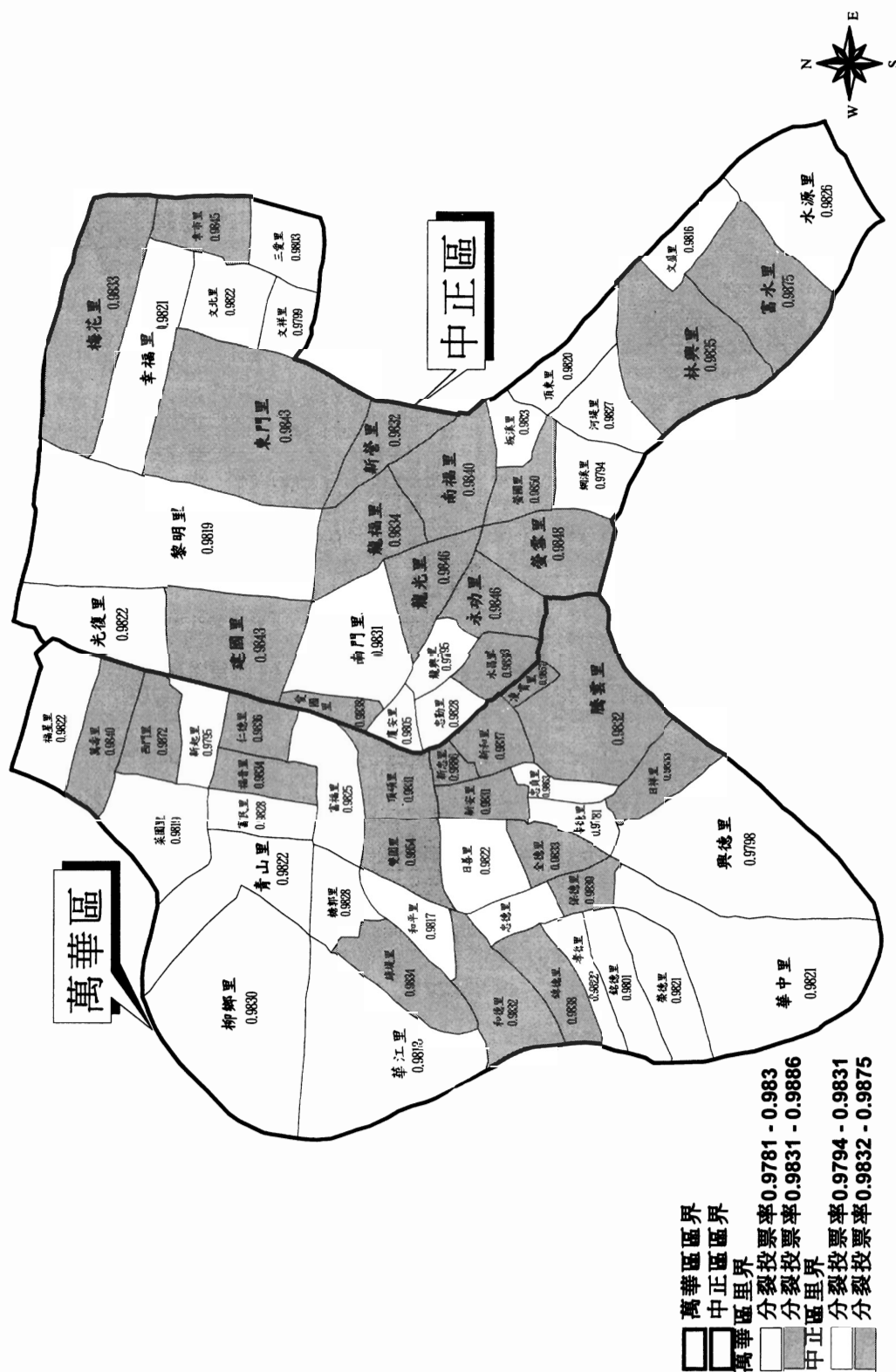


圖18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國民黨之一致投票率：
市議員第五選區（萬華區、中正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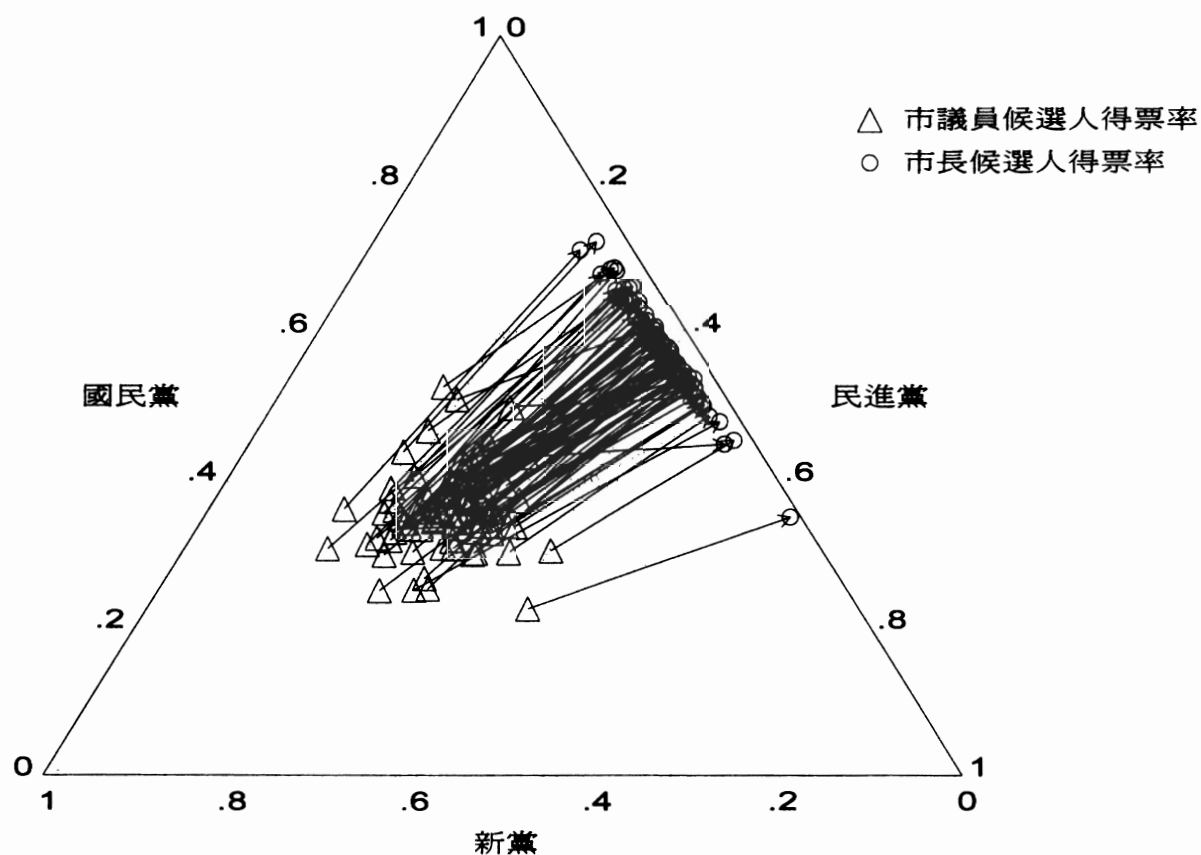


圖21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議員第六選區各里三黨之市長與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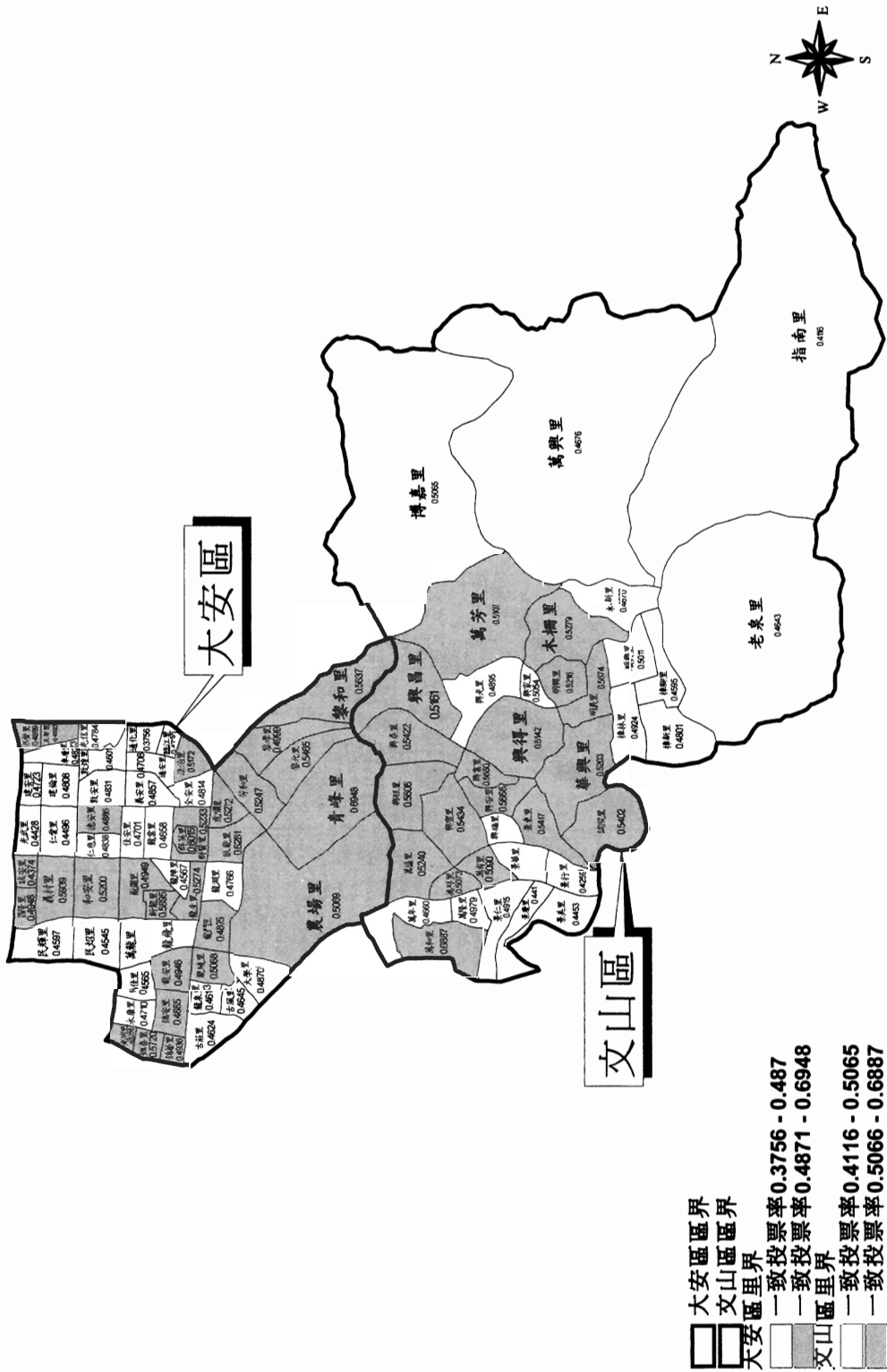


圖22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國民黨之一致投票率：
市議員第六選區（大安區、文山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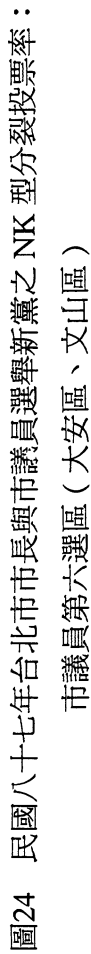


圖24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新黨之NK型分裂投票率：

Split-Ticket Voting in 1998 Taipei Mayoral and City Council Elections

Yi-Ming Wu*

Abstract

Voting tendencies has been the focus of political field.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ecretive voting system, the only way to learn each individual's voting preferences is to take polls. However,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oll results is questionable. One thing that we can be sure of is that the voting results reflect every citizen's decision. It would be a risk of ecological fallacy if one hypothesizes the voting attitude based on the voting result. Based on the voting result in the Taipei election of 1998, first of all, this thesis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split-ticket voting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in City Mayor and City congress. Applying King's EI model analyzes how citizens chose their desired candidates among the three political parties. It also experimentally applies the statistics methods to lower the risk of ecological fallacy. So it turns out that as expected, the supporters of the New Party adapt split - ticket voting by voting KMT's candidate Mao Ying-jo. The rate of split - ticket voting reaches 98.29%. In addition, split-ticket voting also happens to the supporters of KMT's congress. The voters in split-ticket voting vote for DPP's City Mayor candidate Chen Shuei-Bien. The split-ticket voting rate registers 48.28%.

keywords: ecological fallacy, split-ticket voting, Taipei election strategic voting

* Mast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